

分类号: K890

UDC: 300

学 号: 601005

密级: 公开

温州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研究

*THE RESEARCH ON WENZHOU COMMERCIAL
FOLK CULTURE*

作者姓名: 唐永喜

学科、专业: 民俗学

研究方向: 区域民俗学

指导教师: 张靖龙 教授

完成日期: 2009年3月

温州大学学位委员会

温州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温州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论文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温州大学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温州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温州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论文成果，知识产权归属温州大学。

保密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论文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研究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异军突起，引发全国温州热，温州研究也随之升温，但目前温州商业民俗的研究还没有专门的论著，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民俗资料的收集和编纂上，一些相关的研究散见于一些历史文化著作中。温州商业经济发达，商业习俗是其地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温州商业民俗研究对于我国区域民俗以及商业民俗的研究都具有丰富和深化的价值。发扬商业民俗中优良传统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促进温州经济文化建设都大有裨益，对温州商业民俗中的陋俗部分加以引导和改造，也有利于温州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本次论文主要分为两部分，上编主要通过对温州商业民俗文化中的主要民俗事象的流变进行考察，把握温州商业民俗文化中民俗事象的传承脉络，探寻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的区域特征。

下编对温州商业民俗文化进行分析，努力总结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的区域特点，并从温州区域的地理历史文化中探寻温州商业民俗文化区域特点的形成原因，并对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研究价值进行阐述。

通过上述论述可以发现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的区域特点是温州区域地理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并对温州区域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温州，商业民俗，地理，移民，重商主义

The research on Wenzhou commercial folk culture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rise of Wenzhou economic has sparked nationwide Wenzhou hot, the study on Wenzhou also been warming up, but there aren't any specific theory on the commercial folk of Wenzhou's study, and most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been concentrated in the collection and compilation of the folklore, some relevant research scattered throughout a number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writings. Wenzhou enjoys a flourishing commercial economy and the commercial folk have been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local culture. The research on Wenzhou commercial Folk has enriched and deepened the value of China's regional folklore and the research on commercial folk.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fine tradition of commercial folk will be beneficial not to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promoting economic but the development Wenzhou cultural. To guide and transform the vulgar part of Wenzhou Folk commercial will conducive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Wenzhou commercial economy more healthily.

This thesis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which mainly inspects the evolution of the representative folk items in the commercial folk culture of Wenzhou; try to grasp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he items in Wenzhou Folk Culture, to explore the region characteristic of commercial Wenzhou folk culture.

By the analysis of the provision of commercial folk culture of Wenzhou, the lower part efforts to summarize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mercial folk culture of Wenzhou, and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mercial folk culture of Wenzhou, from the region, cultur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Wenzhou, and to describe the value of the study of commercial folk culture of Wenzhou.

Through the above-mentioned expositions, a fact can be found that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ommercial folk culture of Wenzhou are the result of the regional geography and many othe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of Wenzhou, meanwhile, they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region culture of Wenzhou.

Key words: *Wenzhou, commercial customs, geography, immigration, mercantilism*

目 录

引 言	1
上编 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研究（上）	1
1 商业行为方式的民俗流变	2
1.1 贸易市场	2
1.2 集市贸易	4
1.3 温州庙会	7
2. 商业方式的民俗流变	12
2.1 行商	13
2.2 坐商	14
2.3 居间商	20
3. 温州商业会馆的民俗传承	24
4. 温州商业标志的民俗传承	25
4.1 叫卖与代声	25
4.2 招幌	26
4.3 商家字号与匾额	27
5. 温州商业语言民俗传承	28
5.1 商业秘密语	28
5.2 商业谚语	29
下编 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研究（下）	30
1. 温州商业民俗的特点	30
1.1 温州商业民俗渗透着区域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	30
1.2 温州商业民俗中商业和手工业结合紧密相辅相成	31
1.3 温州商业民俗中温州商人性格中的两面性	32
2. 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特点解析	36
2.1 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	36
2.2 移民因素的影响	38
2.3 瓯越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	41
3. 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研究价值和意义	45
3.1 丰富我国民俗学研究内容	45
3.2 丰富温州区域文化内容	46
3.3 促进温州商业发展和社会良性运行	46
结 语	47
附图	47
致 谢	52
参考文献	53
附笔者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55

引言

温州商业经济发达，历史悠久，温州地方文献有关商业的记载也较为丰富，但温州商业研究中涉及商业民俗的部分散见于《浙江民俗》、《温州民俗大全》、《温州民俗》、《温州模式丛书》、《温州市志》等书，这些文献为进行温州民俗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这些材料丰富详实，但多为描述性的材料，理论的深度开掘还留有大量空间；温州商业民俗只在学者们研究温州民俗和温州文化时偶尔涉及，在各类文献材料运用方面尚有较大缺憾；在考察和分析区域的民俗事象时，其流变发展的逻辑脉络不够清晰……客观上为本研究提供了较大的创新空间。

流动性是商业的一个本质特征，商业民俗趋同性的特点在相互模仿的基础上产生，并在商品流动中突显出来，趋同性与区域性特质水乳交融不易分离，成为研究的一个难点。笔者努力在商业民俗文化的研究中既从微观上面考察温州具有典型性的民俗事象，也宏观地分析较大区域和历史时期的整体面貌；透视温州商业民俗，既做当下的考察，也追溯源流和变迁；既从宏观上关注温州商业民俗的总体状况，也从微观上面考察某些具体的商业习俗；从温州商业民俗横向和历史纵向的比较分析了解温州商业民俗的特点，力求深入探讨温州商业民俗的传承与发展，对商业民俗文化乃至民俗文化的研究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上编 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研究（上）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异军突起，别具特色，饱受争议，聚焦了当代中国太多的关注目光。温州偏处大东南一隅，位于浙江最南部，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市辖鹿城、瓯海、龙湾三区，瑞安、乐清两市(县级)及洞头、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 6 县，历史悠久，为著名沿海城市。

温州历来以商业繁荣著称，商贸业一直在温州古代经济中居重要位置，温州农副产品丰富，手工业发达、水运便利为温州古代商贸业提供有利条件。早在南朝，永嘉已是“利兼水陆，实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1]，北宋绍圣间，永嘉郡守杨蟠诗“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帟绕画楼”^[12]描写温州的繁荣。程俱言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多贾”^[12]。此时，温州城“市里充满^[2]”人口繁盛，已有“市声瀕洞彻子夜，晨钟未歇，人与鸟兽偕起^[1440]”的夜市，其盛况如杨蟠《永嘉百咏·永宁桥》诗“过时灯火后，萧鼓正喧阗；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圆”^[1440]。元时，温州郡城“百货所萃，麇氓贾竖，咸附趋之^[1442]”以致清开禁后，“商贾辐辏^[15]”，“贾客四方民^[15]”。商人众多，商业繁荣，促进

了温州对外交通、贸易的发展。温州成为“大商海船辐辏之地”。并成立了市舶务，建有待贤驿、来远驿，招待各国商人。早在唐中期，温州就开始对日贸易，五代后梁初温州设置博易务，南宋绍兴初温州亦设市舶务，元代温州为“藩舶夷琛之所填委，气势熏酣，声光沦浹”^[1469]。北宋咸平初周仁赴高丽经商被留，宋绍兴间温州巨商张愿世为商贾^[1466]，为温州外贸业做出了贡献。至近代，1938年温州进出口货物价值达562万元，开办大小工厂200余家，私人钱庄30多家。江西、安徽、福建、湖南及四川的客商纷至沓来，云集于温州。温州发达的手工业和擅长经商的历史传统一直对今天的经济模式产生深远影响^[3]。温州人异常勤劳，机灵乖巧，肯钻研、善模仿，走四方，敢闯、敢冒风险具有强烈致富欲望，具有典型的商人性格。温州的商业传统与温州人的商人性格，给温州区域文化涂上浓重的商业色彩。

商业民俗是指在某一民族或区域的商业生活中，由人们传统承袭的、具有较稳定的表达方式的、并对人们从事的商品交易活动及其与之相关的言、行、思具有来自传统习惯的约束力量的有关商业活动的习俗惯制^[4]。商业民俗与商业生活紧密相连，水乳交融，商业民俗随着商业生活的变化而改变。在温州悠久的商业历史背景下，温州的商业民俗文化在长期的商业生活中逐渐形成，温州传统的商业民俗表现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

1 商业行为方式的民俗流变

商业行为方式民俗是商业民俗诸事象中最常见、内容也最为丰富的一种。主要为：

1.1 贸易市场

贸易市场是商品交换的空间，“市”就是在城中划出专门的地方设立指定的交易场所，“市”是我国最为古老的贸易市场形式，是交易的一种较为成熟阶段，“市俗”是贸易市场民俗的突出表现。

“市”在我国古代最初的城市—都邑中就已存在，为常设的特定交易场所，市内有各种各样的“肆”，即陈列商品的货摊^[5]，就是后世的摊位。对于市的管理规范也与市的发展相应。《周礼》中所记的西周的市制，市设“市长”，市中“分行列肆”，“名相近者相远，实相近者相尔”已按商品的种类和价格分行陈列；大市进行分时段的分流管理；各行肆由“肆长”进行管理；官设“质剂”（掌管交易契约的官员）签订、查验官发的契券，交纳一定的契约税，禁售违禁品。“贾师”评定入市商品的等级、价格等。^[6]，可见西周时，官府对市的管理就已相当严格了，可算作是中国古代市制的典形，是今日市制的源头。汉唐基本沿袭两周的“市制”，据汉《三辅黄图》^{[6]125}唐韦彪《三辅旧高》^{[6]126}的记载，市有市墙、市门，各有市官管理，定时开闭。市有市官管理。有指定区域，称为“坊”、“市”分区，市内按行业来划分“列肆”。市中还有市官监临的“旗亭”，初步形成古代工商业的雏形。

温州唐时郡城有百贾坊，弘治《温州府志》卷六《邑里·坊门》载：“永嘉县：唐百贾坊，宋改今名（太平坊）”^[1439]据王锐先生考证，唐中叶时，市中的行业分工已较为具体明确，商业行肆组织“团行”初步形成。设于“市”中酒肆、饮食店、客店、邸店等更为活跃。温州商业经济到了宋朝更加繁盛，据《宋会要辑稿》载宋熙宁末温州旧城及瑞安、永安、平阳县、前仓、柳市镇六务商税四万余^[1439]。商品经济的繁盛和城市市民文化的兴起，传统的市制亦

被打破，代之而起的城市中商业设置，则以街区商业为主要类型，冲破了市、坊分区的地域限制和“日中为市”的时间限制。大体上有“日市”，“夜市”、“季节市”、“专业市”等类型^{[4]26}。

“日市”一般为坐商店铺集中的市场，已打破传统的“分行列肆”的传统，沿主要街区不专设置于官方“市”中，一些闹市街区，开始出现了各行的配套网点，一般早上营业，天黑闭店。“夜市”则主要是在居民居住和活动集中的街区及“市瓦”技艺区中存在的夜间营业市场，一般以饮食业、小吃、杂卖为主。真正意义上的夜市，出现于唐后期，盛行于宋代。温州宋代坊市昼夜喧阗，时郡守杨蟠《永嘉百咏·永宁桥》：“过时灯火后，萧鼓正喧阗。三十六坊月，一般今夜圆。”《浣川集》卷五《江山胜概楼记》有“已故市声瀕洞彻子夜，晨钟未歇，人与鸟兽偕起”^{[1]440}其盛况可知。“季节市”按商品时令或节令民俗活动出现的市场，售时令性较强的商品。另有一些定期的集市，如“灯市”、“庙会”、“会市”等，与民间生产生活的季节性特点相对应。坊市制度崩溃，店铺分散于各地，官府为便于征派、纳税和集中管理，又集中设市，形成一些专业性的集市或市场——“专业市”，这种体制成为近代商业街区及网点的典型形态。明清的城市商业，市的设置已无统一规定，商业店铺基本上追求便利依自身条件就近设铺，经营时间上也有了较大的自由。纵观市制的产生发展，古代市制集中设市和集中设点的特征在市制的流变中得以留存，一些专业的街市，常常以某一地区为主，相对集中；某些地方亦保留了集中设点的贸易市集的方式。现在各地大中城市中集中设点的个体商贩市场和大型商场，是对古老市制的传承。

温州的商业区的分布和形成正体现我国传统市俗的这两个重要特点的传承。据叶大兵先生的调查资料^[7]，温州城区五马街过去是繁华的中心区，这里商店密布，是绸布、百货、铜锡器皿、中西药、银行、钱庄、菜馆等的集中地。东门靠近瓯江过去以山货、南北货、鱼行等为多，闽货、西楠溪货物在此设代理处。南门外以水果、茶、柑、棉纱、伞骨等商肆为多。小南门外靠近会昌湖和南塘河，水上交通方便，以米行、鱼行、内河航运、锯木等为主，温州至青田的糖行也在这里设店经营。木材、山货多来自江上游，并靠木筏装运，因而西门外以上水木行、下水木行、山地货行与木炭、水产等为主；麻行外则以竹业、炭行居多；朔门外以内河航运、报关、鱼行、木板、竹器、海鲜为多。康乐坊的钢丝、铅丝、帆船用品；城西街大多为旧家具；府前街大多为书店、照相馆、银行等；还有一些专业巷，如卖鱼巷、打绳巷、打铁巷、打蓬巷等。限于历史条件，当时温州城乡市场数量少，规模小，设施简陋。农村的传统集市贸易多在固定场地露天交易，城镇贸易市场大多沿街设摊，或搭简易棚架经营。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在温州市区和城乡设立各种大规模专业商品市场和各种专业街，已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市场体系，市场建设和商品经济发展呈现一种良性互动。温州的专业市场，“以商带工”、“小商品，大市场”与民营经济紧密相连。市场和民营经济互为条件呈现双赢局面。生产原料、资金、劳力、技术、信息源自市场供给，产品依赖市场销售，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市场的繁荣与活跃。早期温州家庭工业生产的小商品，主要借助于专业市场推销，采取产销直接见面的方式进行。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专业市场产销直接见面的载体作用逐渐弱化被连锁制、代理制、配送制等多种新型营销方式取代。近几年来，专业市场的发展呈现新的特点：专业市场和市场网络并存；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并存；内销和外销并存；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并存等。到1998年全市已有包括桥头钮扣市场、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等著名专业市场在内的各类市场513个，其中专业市场363个，综合市场150个，年成交额亿元以上市场27个，成交额86.9亿元，占全部成交额61.6%^[8]。温州著名的工业品

市场有：桥头钮扣市场、柳市低压电器市场、鹿城区鞋业市场、北机电泵阀市场、温州温州市牛皮批发市场、水头猪皮革市场、东方灯具大商场、妙果寺服装批发市场、以及瑞安场桥羊毛衫市场、平阳鳌江塑料纺织袋市场、苍南宜山再生腈纶市场、苍南龙港毛毡市场、苍南金乡标志工艺品市场、瑞安仙降塑胶鞋市场、温州打火机市场、瑞安商城、温州商贸城等。农副产品市场有：虹桥综合农贸市场、海浙南粮食批发市场、温州市干鲜果批发市场、苍南县中药材滋补药品交易市场、浙南小产品批发交易市场、鹿城区广利农贸市场、鹿城区三角巷副食品批发市场、温州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苍南县副食品批发市场等。生产资料市场有：鹿城钢材市场、温州市不锈钢市场、温州木材交易市场、温州旧机动车交易市场、乐清金炉铁皮市场等。其他专业市场有：民间金融市场、银行金融市场、民间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房地产交易市场以及各种技术信息市场等。^{[7]423}

市区形成众多的专业街，鹿城区信河街为服装街、来福门一带为皮鞋街、五马街为百货与珠宝首饰街、三角巷为副食品街、康乐坊为紧固件街、飞霞南路为汽配街、矮凳桥为灯具街，等等。在同业集聚的同时，又出现了同一产品的不同品种间实行细分，以自己的特色名牌吸引顾客，这是由于商品发达而形成的新的发展，服装街分为男装、女装、童装、西装、衬衫、休闲装、运动服、便衣、皮衣、羊毛衫、体恤衫等等专营店铺。还有名牌服装专卖店，如鳄鱼、花花公子、苹果、皮尔卡丹、佐丹奴、真维斯等。这些连锁专卖店还向农村集镇扩散。

专业市场的发展是过程是温州经济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温州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1.2 集市贸易

集市贸易主要以民间的小生产者如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小摊贩的直接交易为主，时间上以隔日、数日或隔月一集的形式进行。集市的习俗，源于“日中为市”的贸易传统。汉《三辅黄图·长安九市》所描述的汉代长安城外七里处太学附近的“槐市”即属此类。^[9]东晋时期，在市郊及较大的居民聚落中又出现了“草市”。草市是对州县城外乡村市场的通称。最初，可能是草料的定期市集，后来发展成为街区，有商店、酒肆和住户，于是便形成城外的乡村市场。草市的交易主要以客商贩运与乡间小商品生产者交易相结合，有定期开市和长期开市两类，草市交易仍以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及饮食业居多。唐时，草市因商业需要自然形成，都在交通便利的地点，有关草市描述亦多见于唐人诗文小说，可知州县以外，应有为数更多的草市存在^[10]。北宋中叶，乡落“墟市”已有较大发展，市场交易额、品种、数量都有很大增长，集市的经常化与普遍化程度大大提高，市场税收收入比重也大幅增长。从宋孝宗兴隆初年诏记载，宋人《碧溪诗话》^{[9]38}，苏轼诗“春江围草市，夜浪浮竹屋”^[11]，陆游诗“草市寒沽酒，江城夜捣衣”^[12]足见草市之盛。宋代以后，在许多城镇郊区都发展了定期集市，有些较大的集市还上升为“镇”。“草市”逐渐形成为市镇。镇这种宋代新出现的行政单位，是户口较多的居民聚集小区，因其地理位置等原因不宜设置县治；它同时还是一个小范围内的贸易中心，有商税收入。镇的分布疏密，大致与商业兴盛的程度相一致。镇之外，有些地区有市的建置，与镇相似，通常比镇小，方志中往往把镇、市划归一类。与此同时南方农村定期集市即墟场也有了空前发展。在唐柳宗元《童区寄传》、《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七》以及宋钱

易《南部新书》和吴处原《青箱杂记》中都有相关记载^[13]。元代的市場管理，在宋朝取消“市坊制”的基础上更加开放，主张陆上贸易(包括集市贸易)。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贸易，一律自由往来，但海上贸易由国家垄断，并与民间合作^{[9]39}。

元时，温州黄缙《永嘉重修海堤记》有“……亭之西为市区，百货所萃，麇氓贾竖，咸附趋之”^{[1]442}可见当时盛况。明清时，温州市镇发展很快，多见于地方志记载中。永乐《乐清县志》卷六《古迹》载有镇市故址，卷三所载镇市有石马镇，馆头镇，楚门镇，温岭镇。柳市，新市。^{[1]442}弘治《温州府志》卷六《邑里·市镇》载明弘治间温州有廿二市十镇。^{[1]443} 万历《温州府志》卷一《輿地上·市镇街巷附》载明万历年间温州有廿六市十镇。^{[1]444}崇祯《泰顺县志》卷一《輿地》载明崇祯间泰顺县新增百丈市。^{[1]444}乾隆《温州府志》卷五《城池·都里》载清乾隆间温州有市廿八镇十^{[1]449}。同治《泰顺封疆录》卷二《輿地·风俗》载泰顺县旧有罗阳市。^{[1]450}

农村集市都有约定俗成或官定集期，相间二日、三日、五日、六日、十日不等。前往农村集市进行交易，则叫市集、市合、趁墟、墟集、赶场等，温州地区为“会市”，称呼虽异性质相同，为乡间初级市场的主要形式。在传统的州县中，各村镇的集市往往是交错进行的，集市的情况一般是上午热闹，下午冷清，每到赶集之日，村民和商贩云集，热闹喧腾。

明清时温州地方小市场，即墟集、草市已颇具规模，有了进一步发展。光绪《乐清县志》卷三《规制·街市》载清光绪间乐清集市有期：“新市三、八日市。湖边一、六日市芙蓉二、七日市。白溪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市。大荆三、六、九日市。白石三月初十市(按《隆庆志》)：西乡有柳市，旧传按日立市，今第存其址，名为基坛云。又东乡有万桥市、窑香市、水涨市，今俱废)。石马镇，馆头镇(按《隆庆志》)：外有楚门镇在玉环乡，温岑镇在温岑，俱成化十二年隶太平。又有乐清镇在县南四十步，湖头镇在桥边，故址犹存。樊子镇在茗屿乡。新溪镇在瑞应乡，云门镇在山门乡，俱见《志余》，附识于此。”^{[1]450}光绪《玉环厅志》卷二《建置·街市》：“西青街在永清门外，居民贩鲜聚市于此(同知陆玉书诗：‘清晓城门扇扇开，贩鲜人趁海潮来·黄鱼白鲞同虾蟹，都把樵苏换的回’)。后湾街在十二都后湾村，十二月十七、廿二、廿七日市。楚门街在十五都楚门，三、八日市。田奥街在十五都田奥，十二月二十、廿五、三十日市。清港头街在十四都清港，十二月初十日开市，至正月初日止。”^{[1]451}这种市集更是遍布乡间各地，类似称呼还有如“亥市”、“村市”、“山市”、“野市”、“子市”、“庙市”、“草墟”、“村墟”“水步”、“山步”、“道店”等等。

清末民国初，温州各地有各种集市贸易活动，俗称“市日”，即会市，有早市、夜市之分。农村集市多以自然村落为址，城镇的集市常设于繁华街道或交通方便处所，一般都有规定日期，如每月的如每月的“三、六、九”或“一、四、七”或是逢五、逢十，因地制宜，过去，在规定的集市那天，附近各地农民将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和各种手工业品，拿到集市交易。各地客商云集，各划地段陈列出售各自货物，有的地方还和庙会相结合，雇戏班演戏，时有多台演出，称“斗台”。并组织民间表演；有的晚间有化妆游行、扮台阁、放焰火。温州市各县集市很多，以平阳为例，仅农村一年内有十多次会市，时间最早为正月廿一到廿三，万全区的郑楼；正月廿八为榆垟乡的大龙宫，二月十六是鸣山乡的缪头殿、三月三的麻步、清明节的钱仓、七月十八城西的官岙底杨老爷殿、八月初七腾蛇的大夫殿、十一月初六水头街的林四殿等等。还有二月二的湖前、清明日的金乡(一次为九月十一)、三月十五日的宜山、五月十八的鲸头、七月廿五的凰浦。更有与万全区毗邻的瑞安、二月十一的吴桥、二

月十八的仙降等等,和大荆五月大会市最为兴旺。^{[7]427}温州较有代表性的会市、庙会见下表*:

名称	时间	地点
瞿溪会市	二月初一	温州市
白石大会市	三月初十	乐清
蒲岐会市	九月初一至初五	乐清
鹤溪庙会	二月初二	平阳
拦街福	二月初一至三月十六	温州市
上堂殿庙会	二月十四	永嘉
金乡城隍庙会	清明节	苍南
大荆庙会	五月十三	乐清
马仙庙会	七月七	苍南
.....

所有这些会市,商贩、手工业者都纷纷船载、车运或肩挑前来赴集。农贸市场里,小型家具和农具为主,日用百货、棉布、花纱、农副产品摆得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集市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建国后,集市多改称为“百货物资交流大会”或“商品展销会”。

温州集市贸易多与庙会活动有关,比较著名的有以下三个:

1.21 瞿溪二月初一会市

瞿溪是屏纸的主要集散地,位于温州西南,为上河乡边缘地带,介于河乡与山地之间。这里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盛产草药与竹木制品。瞿溪会市是浙南大型集市之一。相传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旧时瞿溪集市,交易有固定的时间。多为早上相聚而集,晚上交易完毕而散。随着集市的发展,人们纷纷在沿岸择地而居,开堂设铺进行商品交换。瞿溪北岸逐渐发展成了商业街。蛟垵山道光十六年(1836)何绍丰墓碑镌刻有“十八都五里瞿溪街”字,可能是民间较早的载述。又清光绪二十年(1894)《浙江水陆道里记·永嘉县图》图上标有“瞿溪街”。瞿溪每年农历二月初一有迎神赶庙会之习俗,农历二月为农闲季节,这样更利于商品交易。二月初一瞿溪固定的会市日成为集市、庙会、商贸、娱乐为一体的民间盛大节日。

文革时期,瞿溪会市一度被取消。改革开放以后,瞿溪的二月初一会市逐渐恢复和扩大,如今会市时各地的商人、游人、探亲访友者都纷至沓来,大街小巷,摩肩接踵,家家户户喜气洋洋,非常热闹。会市还有唱老戏、说书、鼓词等文娱活动,临街还摆着各类农具农用物资、牲畜、针棉织品、铜铁器、日用百货、五金交电、家电陶瓷、儿童玩具及各类工艺品等供人们选购,入夜还摆设彩楼珠围,百鸟花灯等。瞿溪会市不仅仅是物资交流会,还是一个民间的狂欢节。

1.22 白石三月初十大会市

白石三面环山一方临水,背靠括苍山,面向柳市平原和整个瓯江下游平原,是上承山区、

*温州集市和庙会材料部分资料来源是笔者参与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浙江2008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整理的内部资料,特此说明。

下接平原的物质集散地。镇域内有国家级风景名胜中雁荡山，山川灵秀，风光宜人，会市中心马道滩面积四十七亩是天然的农贸场地。相传，在宋末元初，白石会市就已经形成。南宋中期，瓯江口岸的慎江马道，有一位出身望族的太学生陈友谅，娶白石钱姓女，钱氏随带龙山四亩山地陪嫁。陈友谅夫妇亡后葬此山，元朝至正年间，黄华长林临近慎江，有一姓南的泉州晋江县尉，爱慕白石山水，亦在此地立坟。陈、南两族人财两旺，清明扫墓，祭礼丰盛，吹吹打打吸引了许多观众。且两族人多从事渔业，逢祭祀则携带海鲜来白石交换山货，代代相传。与此同时，发生这里的春耕农贸，男女踏青寻芳，家族清明祭祖，三者时间大致都在农历三月前后，如此年复一年，约定俗成，形成一个传统大会市。有关白石会市最早文献记载见于清道光《乐清县志》：“白石市，在九都，三月初十市。”^[14]市日历时一周，农历三月初十为高潮。会市中的商品从最初以山货为主发展到今天的百货云集，会市具有南方特色，已为浙南地区大型的农贸集市。

会市之日，三平方公里的市场内，货摊鳞次，人群簇拥，在会市期间，当地群众像过节一样打扫庭院，准备酒菜，邀请亲友逛会市，据 1997 年统计，会市期间上市的人次达四十多万，客商四千余家，近的如温州、台等地的小商贩，甚至有来自宁波、上海等地的客商。近几年的会市更倾向于旅游，上市的人到中雁荡风景区，玉甌索道从早到晚，乘客有点排了两个小时还轮不到，玉虹北路至玉甌峰下的游道上，约为二十余里，男女摩肩接踵，三湖、西漈、东漈景区，也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1.23 蒲岐九月会市

蒲岐九月会市最早追溯到明朝。《蒲岐镇志》记载：“明成化十二年（1476 年），蒲岐山海货交易颇盛，设市”此市即最早的九月会市，蒲岐地处海边，海产丰富而交通便利，四面八方客商云集。过去会市为期五天，定于每年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五，现在时间有些延长，历史上的会市以“三多”著称：商品多（工业品、手工艺品、土特产倾其可能应有尽有）、客商多（小商贩除了本镇和周边乡镇的，还有来自温州、台州、丽水、宁波等地甚至上海）、顾客多（顾客多携家带眷，人流如潮）。九月会市还有许多游艺节目，如秋千、抬阁、高跷、焰火和电影戏剧等活动，人们一边购物一边娱乐，九月相对于乡下农人来说比较空闲，夏忙已过而十月秋收尚未来临，气候适中，海边人豪爽，更好客，九月会市一到，便隆重地请客观会游玩。九月会市的庙会，可谓“农夫释放耒，渔夫搁网，女人停杼，学子抛书，系数卷入欢乐的狂潮之中，赶会的男女填街塞巷，挥汗成雨，呵气成云。”是蒲岐人狂欢节。

1.3 温州庙会

庙会，起源于古代的社祭，一般设在寺庙所在地附近，是祭神、游乐、贸易“三合一”的传统方式。温州庙会是江南庙会的较为典型的代表。江南庙会疏淡于社会政治，表现出较强的封闭性和区域性，庙会的祭品和祭祀礼仪也更为繁杂^[15]。现代的庙会，往往是人们进行文化交流、娱乐活动、旅游观光和进行各种商品贸易的场所。庙会给附近居民购物和娱乐提供了方便，又活跃了市场，丰富了人民日常的文化生活，是最具特色的中国民间集市形式之一。温州较为著名的庙会主要有：

1.31 鹤溪庙会

鹤溪位于平阳县北部,距县城 18 公里,地处半山区,北高南低,带溪、霞溪、鹤溪三条溪流流经全境,鹤溪庙会由鹤溪境内庙(俗称老殿)、灵佑殿(俗称林四爷殿)、南山宫和娘娘宫等诸多庙发起,是鹤溪民众自发组织的民间活动形式之一,庙会期间各路商贾云集,热闹非常。清朝初年鹤溪许多官庙已经在固定时间举行庙会,官庙碑文记载乾隆年间为祈求神灵保佑,新建娘娘宫重修灵佑殿,于二月初二举行盛大的落成典礼,四面八方客商云集于此,台阁、高跷等民间表演也前来助兴,热闹非凡。镇境庙和南山宫也把庙会改为此日,于是形成鹤溪庙会。文革期间鹤溪庙会一度中断,上世纪 80 年代鹤溪庙会重新恢复举办。

鹤溪各个官庙供奉有白鹤大帝、太阴圣母娘娘、陈十四娘娘和林泗爷等神,旧时祭祀庙神是庙会不可或缺的一种仪式,主要分为迎神赛会和演戏敬神两种形式。迎神赛会即“神像出巡”,队伍按照一定的顺序依次行进,场面壮观。敬神所演的戏被本地民众称为神戏,戏曲内容多与祭祀庙神关系密切,每次庙会都请戏班唱戏酬神,五个官庙同时演戏,种类繁多,各具特色,越剧、瓯剧、京剧、昆剧、和局、提线木偶和单档布袋戏等,热闹非常。鹤溪庙会精彩纷呈的踩街、游玩和鳌灯等传统活动保持如此完整,在整个平阳乃至整个温州地区的庙会已不多见。踩街活动类似迎神赛会,但宗教色彩大为淡化,没有神像出巡,多为娱乐,扮台阁、踩高跷,串马灯,滚龙、敲腰鼓、跳扇舞和扮八魔等,它们大多属于民间表演艺术形式,均配备锣鼓唢呐伴奏,吹奏敲打,声势浩荡,成为街头巷尾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庙会之时,小商小贩而至,庙旁、街边纷纷摆上风味小吃摊位,棉花糖、番薯干、棉菜馍、牛杂碎、灯盏糕、松糕之类,百味杂陈,香气扑鼻。许多小玩意儿,如拨浪鼓和小泥人等小手工工业品也是庙会上畅销品。

1.32 拦街福

拦街福,是温州特有的地方性传统节日,农历二月初一,在温州城内,从东门康乐坊拦街福开始,到三月十六拦街福拦到府前街为止,约 40 天,温州各街巷通衢,设醮禳灾,祈天降福,榜曰“春许冬还”,是拦街春祈福之意,故名“拦街福”,亦名“平安福”。有诗云:“春许冬还愿若何,家家齐唱太平歌。拦街不用多祈福,但的平安福已多”^[16](《瓯江竹节词》)。清中叶,拦街福习俗已流行于温州各地。《乐清县志》(十六卷·清光绪二十七年东西郭博古斋副本)岁时民俗:“夜张列炬送神,小儿击鼓,制各色花灯,备极之致,灿若繁星,达旦乃止”^[17],清乾隆《永嘉县志》载:“二月朔,通衢设醮禳灾,名拦街福,以后循次取吉为之,至三月望日为止。”^{[1]225}

“拦街福”的文献记载多与酬神赛会有关,其盛况记载散见于温州地方文献:

“拦街福元宵,郡城厢隅,除小巷外,尽构松棚,以事点照。北起双门,直穿南门江外卖茅桥而止。西自百里坊竞透迎恩门外,越浦桥、横街至广化铺而止。府前街,自府门首接五马街,卫前亦然。五马街东接大街,经道前街西至大来桥。新河自八字桥南至龙首湖,西折至山脚门而止。小南门街北接五马街,直至洋头而止。凡诸衙门门首及市镇总会处,特结整山。每岁开正初七八际,先架横木一二,曰过街。接续构完,以期十三夜上灯,至十八九日方止,大约丈余地悬灯一行,行四五盏,傍加柱灯

者有之。其灯制有花鸟、虫鱼、人物、器皿诸状，曰青田灯。或成走马灯，假灯气运机顺逆交驰者；或剪褚成人物、花鸟及草书诗句为雪灯者。亦有间用竹丝、珠围、料丝、羊皮、麦管诸灯，以自异者斗胜争奇，莫可弹述。好事者或开别馆，临衢张画焚香，喧闹鼓吹，遇亲识经游，邀款茶酒者有之。儿童结伙踏歌，一唱百应，遇别伙歌者与之较胜，谓曰撞歌。逐利市肠。蒙假脸、著斑润衣，或弄馆除，或戏狮子，击鼓鸣金，沿门索赏。城居妇女出游，浓妆丽服，连快徐行，旁午交错。村居者亦事妆饰，多以膀造钗环，配以色服，操舟至城，昼游于市，及灯盛庙宇至夜方归。余当髫髻之年，无岁不然，虽经倭变，如王子以至己未、庚申诸岁未始废辍。此后惟仅见于隆庆戊辰，其年灯节既迈，县家遵道尊命，令民构棚，然灯从十八日至廿二日方止，维此至今，易为欢门，渐流略简。其制取带叶二竹，分树道旁，上结其抄，中横贯以梁为悬灯用；亦有对角交结，穿其顶如望山状者。初年布列甚密，悬灯亦尚佳品，昼日挂彩，昏夜明烛，恢耀辉煌，虽亚松棚亦侈观美。晚近欢门虽设，苟简殊甚，灯用提笼，徒为虚器，宁望昔日之繁华，以为熙朝之盛事哉。夫自戊辰迄今，岁更三纪，凡生长嘉靖之年与夫万历之间者，耳得而闻，目未之睹。缅念畴昔，不能不有感于都人士之章而为之三叹邪。”^{[17]208}（《歧海琐谈集》）

“拦街福，温俗之酬神赛会也。土风以二月十五日至三月十日，城中各户酬神，设牲于道，张灯结彩，吹笙鼓簧，六街灯火，彻夜不绝。酬神后迎东岳会，会中有方相氏，高与檐齐。它则黄金四目，雉拜娑娑，旁街曲巷，必须周历。终一月恒费万缗，繁华之习，他处罕见。询之土人，其说有二：一则不酬神赛会，则一年之内，人多疾病，地方不安。二则费用虽广，市内贸易，因乡人之来观，亲戚之聚会，可添数倍。若节此，转觉生意寂然，故街市乐此不疲也。南唐刘崇远《金华志杂编》：‘长安坊中有拦街铺设，中夜乐神，迟明未已云云’，温之拦街福盖本此。”（瓯江小记）^[18]

“俗名‘揽街福’，亦不详所自出。余为综其前后以言之，大率趁暮春修禊之节，仿六朝斗草之戏，假方相逐疫之仪，行八蜡报神之典，排波助澜，牵强附会，犹之龙舟救屈原，今日因之竞水嬉，寒食吊介推，后人遂以设野祭耳。流俗沿误，何能悉正？（清郑传笈《杂著初编·东瓯观花祭记》）”^{[18]208}

“廛出夫里之布，用以幕天；人进使宅字钱，因之买夜。凡起自八字桥之北，转沿乎百里坊而南，……招乐部，建戏车，镣质为山，负之鳌背。铜机引水，转以龙头。植参军之戏，绿衣秉筒。逞矫童之技，黄帽乘较。各征歌舞于帝江，用助喧阗于人海，则春城启而杂戏陈也……”（清张泰青《瓯城灯幔记》）^[19]

“拦街福”这一习俗，最早可能是单纯的酬神赛会，后逐渐增加娱乐成分，逐渐演变为定期的民间传统的文化娱乐综合节日。商人们借此日夜开市，进行贸易活动，形成信仰、娱乐、贸易三位一体的独特传统民俗形式。拦街福民俗富于温州特色，深受当地人民喜爱，成为吸引大量游人参与的年度盛会。

“拦街福”民俗现有文献记载的出现于明末清初，因为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大约止于民国 37 年^[20]。1952 年温州城乡物质交流会时，曾举行此类文娱活动，为时 3 天，不称拦街福。改革开放以后古老的拦街福焕发青春，2002 年，由温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温州旅游局和温州华亭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承办的新拦街福活动，使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传统民俗重新焕发新的生机，在传统民俗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从区域上区分为三块，五马街区、

蝉街、人民广场;及连接上述三个街区的府前街气氛布置。五马街区以传统民间工艺品展示为主,设置了花木造型、中秋小摆设、首饰龙、档龙、珠灯、走马灯等大型传统工艺美术作品;人民广场开辟为美食小吃广场,集中了温州传统的名点小吃;广场中设置旧时拦街福的保留项目——戏曲斗台;广场周围设置用米塑的寿桃山、凳板龙、大灯笼等传统民间艺术作品。同时,五马街区还举办“民俗风情画展”,展示画家杨景艺、郑家清先生的作品等。从4月19日开始,吸引了大量市民争先目睹这消失了数十年的民俗文化活动,从上午起,活动街区水泄不通,至晚上9时,公安部门不得不对交通进行限制,禁止入内。活动被迫取消。据估算,当日参观人数达20万人^[21]。

2005年9月23至10月7日,首届浙江山水旅游节暨第八届温州旅游节活动期间,温州市政府在世纪广场举办“新拦街福”活动,在温州市区世纪广场锦东路特地搭建的400米长街上,集中了彩塑、纸扎、剪纸、民间绘画等技艺的台阁,做工精细,遍布周身的人物、花鸟栩栩如生。还有展现温州绸塑工艺的大型鳌山、显示温州米塑精湛技艺的寿桃山等等,集中体现了温州民间工艺的博大精深。据有关民俗专家介绍,这次盛大的“拦街福”活动的推出,共包含了木雕、绸塑、米塑、剪纸、纸扎、竹编以及鼓词、木偶戏、杂耍表演等温州民间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等门类,共达12项以上,使温州作为“百工之乡”的美誉又一次得到诠释^[22]。盛大的民俗活动、妙趣横生的民间工艺,吸引了市民的眼光,以旅游风光、民俗风情为题,组织温州地方戏曲文化展演和民间民俗文艺游园活动,举办“百工之乡”温州传统工艺展等,引起轰动,给温州的国庆长假增添了艺术气氛。

1.33 永嘉上塘殿庙会

永嘉县城区域内的上塘殿,又名孝佑宫,位于楠溪江下游江畔的浦东村,依山傍水。殿宇面临楠溪江,背枕五龙山,始建于唐朝。历经元、明、清扩建修缮,在“文革”期间,曾遭受一些破坏,1997年先后修建了月台,戏台,前后两厢、正厅、斋房,建筑宏伟壮观,结构严谨。

殿中的神灵是“卢氏娘娘”。孝佑宫为纪念唐代孝女卢氏而建。据《两浙名贤录》与清光绪《永嘉县志》先后载:“唐天宝元年(公元472年),卢氏居卢岙儿,尝与母出樵遇虎,捋口噬其母,女急投虎喙,以代其母,后人见女跨虎而行,遂立庙祀之。宋理宗赐号孝佑夫人。”上塘娘娘庙会为每年的阴历二月十四日,据说乃唐王钦定。每年庙会,村民抬娘娘全副銮驾巡游。上塘殿锣鼓喧天,铜号唢呐齐鸣,放炮奏乐,香烟缭绕,烛光辉煌,信徒云集,三牲福礼,祭品丰盛,道士法师,念经拜忏,四方信士,祈福许愿,热闹非凡。殿内戏台,表演三天三夜的古装戏,上塘的大街小巷,成为了商贸会市,土特产品,百货商品实行物资大交流,四方民众数万人云集。从阴历二月十二至二月十六,据有关部门统计,客流量高达70余万人次,最多时光临时摊位就有3000来个,营业额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上塘殿庙会至今已有1500余年历史。

1.34 金乡清明城隍庙会

金乡镇地处苍南县沿海平原地带,东、南、西三面濒临东海湾,西北接连山区陆地,金

乡古称瀛洲，明初为抗倭置卫筑城。当时是明代东南沿海、浙闽边陲抗倭的重要城防之一。“金乡卫”是浙南抗倭中心，辖蒲门、壮士、沙园（今瑞安市）三个千户所。金乡清明节城隍庙会也称金乡清明抗倭文化节，是一种大型民俗活动，集岁时节日、城隍出巡和明代抗倭寇牺牲官兵祭奠仪式于一体。金乡人民在每一年一度清明节习俗中形成的以娱神、娱人和缅怀保家卫国英勇牺牲的抗倭将士祭奠为内容，以音乐、舞蹈、崇祀活动为载体，含有历史、宗教、民俗、艺术、商贸等诸多文化内容而形成的传统民间文化活动。金乡清明节的庙会活动主要是以城隍庙为中心，以城隍庙管理委员会为主，城内各村老人协会为辅的民间自发组织结构。活动时间是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六天，活动内容十分丰富。清明前几天，每天都有“赤爷和白爷”两人组成的“桐山跳”，在城内街巷净街。清明节及后两天，民间大众到城隍庙都为自己的祖先（抗倭将士）和家人做佛事，和尚诵经、师公做道场、请城隍爷下殿、城隍爷出巡、义冢地举办祭祀抗倭将士仪式、游街串巷等许多环节，含有迎神、祭祀、娱乐、经济贸易、文化踩街等活动，蕴含丰富的音乐、舞蹈、美术、彩扎等民间文化艺术项目。庙会文化融入了爱国主义精神，在研究区域历史、抗倭、民俗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清明庙会通常还举行盛大的游艺活动。清明节城隍庙会的三天里，城内热闹异常，活动影响广泛，每年均有来自浙南闽东区域的数万群众参与。街上游人看游行、购物、小吃，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医卜星相、江湖术士、三教九流也赶来凑热闹。西洋镜、木偶戏、猴戏、卖膏药、变戏法、拳术表演，应有尽有，各尽所能，吸引游人争相欣赏逗乐。金乡清明城隍庙会活动从明代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因城隍庙曾被粮管所借用，庙会等活动一度停止。2001年4月，在当地人民政府大力关怀下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粮管所搬迁，城隍庙修复，各种活动均被恢复。

1.35 大荆五月十三庙会

据当地传说，清光绪年间，大荆的关帝庙在关公的寿诞日农历五月十三为一年一度的庙会。起初庙会主要是点香烛祭祀关公，同时有演古装戏、顶关刀、弟兄会等活动。由于赶庙会的民众云集，吸引了大荆周边地区的商贾及杂技艺人来荆出售商品，竞献技艺，逐渐发展成庙会与物资交流大会。

五月十三前几天，来自黄岩、路桥、海门、温州、乐清的商贩，到大荆来租店摆摊，热闹异常。尤其是关庙巷，外地客商在狭窄的巷弄内摆满了百货摊、书摊、镶牙摊、膏药摊……。纸扇、蒲扇、草帽、汗衫、毛巾、搪瓷用品、不倒翁、小刀、喇叭、小戏本还有插在稻草把上五颜六色的“十八变”、花公鸡等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无论是外地客商或本地商人，为了商品竞争，招揽顾客，将商店、商品摊都装扮得花团锦簇，整齐醒目。此外还有外地赶来献艺的马戏团、杂技团、魔术团、古戏班等。五月十三一早，大荆山区方圆数十里的乡民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涌来，大街小巷人山人海。早上八九点钟，街上热闹起来了，“西洋镜”、“猴戏”、“变戏法”、大力士捶钉板压条石、卖狗皮膏药等表演。关庙里则前殿关公塑像案桌上，摆满祭祀供品，灯火辉煌，香烟缭绕。戏台上则上演着古装越剧，任人观看。后殿道场上放着一把重九十多斤铁打的“青龙偃月刀”，由各地有武功有力气的青壮年或老人来抓举。挺举过顶、开四门等表演。常被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所鼓掌喝彩。受《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的影响，五月十三庙会这天，大荆地区曾有朋友聚会的传统，那些

仿效桃园结义的结拜兄弟,或要好的弟兄朋友都要到大荆关庙来聚会。

1.36 苍南马仙庙会

马仙,又称马仙娘娘、马天仙、马氏真仙、娘娘妈等,是浙南闽东很有名的女神。南宋镇地处苍南县城南面,马仙宫也叫做“永福宫”,位于南宋镇南宋街道东边。以南宋的“永福宫”为中心,分布的区域呈放射状(东南面是大埔山村的马仙宫,西面是埔坪的“建福宫”、前岐小河马仙宫,北面是观美马仙宫、凤池马仙宫、灵溪沪山马仙宫等)。

景宁县鸬鹚乡横山岭下的马仙祖庙前碑,刻于清雍正年间,《马天仙碑记》记载:“仙母生五代之唐”,而清同治版本的《景宁县志》载唐朝李阳冰在缙云当县令时,写过《马夫人碑记》。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曾任寿宁知县。在《寿宁待志·香火》“今建中名山,所有香火,而建宁尤盛。”南宋镇的马仙宫始建于何时,没有明确的记载,南宋镇北山大厝的《李氏宗谱》,记载着乾隆年间的李氏家族,曾修缮过马仙宫。民间传说明代(据《孙氏宗谱》记载,洪武四年孙华海公,从福建长溪赤岸迁居昌禅大心垵)南宋孙氏祖先,信仰马仙十分虔诚。埔坪“建福宫”的清乾隆年间碑记,记载着乾隆年间重建马仙宫的经过。

马仙原是一个孝媳妇,传说她升仙之后,法力无比,在南宋一带众多的民间传说中,是一个能救治百病的女神仙。马仙信仰的历史悠久,庙宇众多,据不完全统计,浙南闽东约有450座神庙。从庙会文化的层面来讲,南宋镇的“七月七马仙庙会”活动内容比较全面,庙会、庙市、迎神、祭祀、还愿、请戏班演出等,功能齐全。马仙庙会活动在文革期间,曾停止过,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恢复。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南宋镇都要举行马仙庙会活动。规模很大,福会、迎神、祭祀、戏班演出、抽签、许愿、还愿、福会、庙市、特色小吃等一系列活动井然有序。七月七日早晨,先是请道士举行迎神祭祀,请马仙及马仙部下下殿,之后举行迎神游行活动。马仙迎神队伍从早上的五点,到中午的十一点左右,才能回到宫庙中。在举办庙会时,商人寻找机会,进行“市场交易”活动。南宋镇的物资交流活动,在庙会前后5天,以农业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为主,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民间工艺品等等。庙会期间各种小吃种类繁多,各种美食与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令人流连忘返。

温州庙会民俗活动,是集信仰、娱乐、贸易于一身的文化综合节日。流传至今信仰的成分已大为弱化,娱乐和贸易的比重相应上升。对温州传统的庙会民俗文化中体现地方民俗风情的各种文化形式加以充分发掘,并在庙会活动中加以展示,弘扬优秀民俗文化,剔除其中糟粕部分,增添富有时代色彩的内容,让群众参与其中的活动,增加活动的互动性,提高游客的参与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民俗文化魅力和对于旅游业的巨大推动力,使其成为宣传温州地方特色文化、进一步了解温州、了解温州文化,宣传温州旅游的一个亮丽窗口。

2. 商业方式的民俗流变

商人产生于市场交易发展到较高级阶段,对于商人而言,“商业的目的不是直接消费,而是谋取货币,谋取交换价值”^[23],商人通过市场买进卖出,有效沟通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在完成商业买卖的过程中成各种各样的商业方式的民俗形态。

中国传统的商业方式民俗,以有行商、坐商、居间商三种形态为主。

2.1 行商

“商”和“商人”最早就是专指贩运商(行商)而言的^[24]。贩运商是把某地所需物品,或不出产的货物,运送到该地去出售,常以成帮结伙的方式共同出行。较大规模的贩运商,通常都有较为固定的贩运货物品种和贩运流向。商俗实则作为一种游动性的商业经营方式习俗。通常认为“商业”和“商人”名称和历史上的商族有关,商旅、商人、商品、商业,都和古时的商朝有历史的渊源,后人言“殷人贵富”、“殷人重贾”。商族人和买卖人交织在一起,商人成为买卖人的通称。“商”开始专指贩运贸易,坐肆售物为“贾”,即“行商坐贾”,后逐渐统称为商人。从事贩运的行商,其产生要早于坐商和居间商,商周时期已有一定数量的行商(贩运商人)出现了,《易·旅》^[25]的记载商人几乎每事必卜,故外出贩运必先卜而后行,重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后世的商人信仰与禁忌的源头。当时的商贩,主要是亦农亦商或亦工亦商的兼营者。贩运是农工之外的副业。《尚书·盘庚中》有“具乃贝、玉”^{[17]73},《周礼·地官·司市》的记载:当时贩运“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珍异、兵器”^[26],当时行旅贩运以贝、玉为主要的交换媒介物,以牛马、奴婢、珍异、宝货及食物、地方土特产品等为主要的交易对象。春秋战国以后,大量“自由商人”开始出现,《管子·小匡》载:“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贵鬻贱”^[27]。成功的商人要“知内外”(清楚市场商品的供求余缺)、“明远近”(懂得商品贩运的路途远近)、“计贵贱”(核算市场商品的贵贱得失),这些为后世贩运商人所秉承。

温州的行商特别是从事长途贩运的多为海商,是由温州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交通状况所决定的。温州海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发达的海商贸易历史一直延续至清。唐中期明、温、台始对日贸易,日本木宫泰彦《中国交通史》载:“中国大商人如李邻德、李延信、张支信、李处(人)、崔铎等人,都自建海舶,以船主身份多次来往于日本和浙江的明州、温州和台州之间”^{[1]465}。洪迈《夷坚志》丁卷三《海山异竹》载:“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未尝失。时绍兴七年……。”^{[1]466}据《梦梁录》卷十二《江海船舰》的描述,宋咸淳间温台海鲜惮通江浙^{[1]441}。黄缙《永嘉重修海堤记》中“百货所萃,麇氓贾竖,咸附趋之”。^{[1]442}李鼎《李长卿集》卷一九有“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章南楚瓯捍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1]444}《清实录》第十三册第六一十九页《乾隆十四年三月上》载浙江巡抚方观承奏有“温州府为闽浙商贾丛集之地,烟户繁多”。

行商特是长途贩运商,抛家别子,远身在外,商旅之徒的艰险与亲人的牵挂在文学作品中也多有反映,温州的海商家庭更是如此。宋末元初平阳人作《霁山文集》卷一《白石樵唱一·商妇吟》有:“良人沧海上,孤帆渺何之。十年音信隔,按否不得知。”^{[1]468}元时《不系舟渔集》卷三《商妇吟》有:“嫁夫嫁商贾,重利不重恩。三年南海去,寄信无回信。”^{[1]469}道出家人对在外行商亲人的思念与牵挂。清《温州竹枝词》有“东洋红日近扶桑,西洋海水逼穷荒。劝郎莫作飘洋贾,海上风波不可当。”^{[1]471}诗文从一个侧面道出在外经商特别是海商的艰辛。在对边远地区和境外的长途贩运中,为保障旅途的安全,常结成较大的商队,甚至携带武器。唐代元稹《估客乐》诗中说:“估客无住著,有利身即行。出门求伙伴,入户辞父兄。”^[28]《唐会要》卷八十六《关市》有“若乃富商大贾。豪宗恶少,轻死重气。结党连群,暗鸣

则弯弓，睚眦则挺剑……”^[29]等等。这种商人内部的自行组织方式，多半带有“走江湖”、“闯码头”的民间帮会性组织性质。

小本经营的城乡贩运商，多为走村串寨的乡间货郎或走街串巷的街头小贩。经商方式比较灵活，对现金收入较缺乏的村民，也可以进行赊卖或以农副产品等实物换货。温州作为沿海城市其行商的交通工具多用船，货物也多为海产，具有显著的海洋性特点。温州洞头海岛在新中国建国前没有固定的农贸市场，农副产品都采用走乡串户的叫卖方式销售。贩卖鱼货者的俗称“担鲜”（“担鲜”者在张网作业区的岙口等候张网渔船入港，他们买下鲜鱼货走乡串户叫卖。因卖的都是鲜鱼货，故名“担鲜”。），卖的大多是当日捕捞的鱼货，要等潮水看“流汐”。陆上“行贩”向商行赊账得到货物后，或自己制成现货，挑着货担到街巷叫卖，有豆腐担、鱼鲜担、水果担、缸罐担、料货担、粉干担、索面担、土草药担等等。此外还有修雨伞、补鞋、打小铁等小手工业行贩，肩挑手提，走乡串户，沿村叫卖。在收取货币外，也有以货易物的，都有一个约定和交换数额，以麦换索面、以谷换豆腐，以米换米糖等。有一种是货郎担，亦叫“卖销客”。靠肩担、手提到各乡村，流动售货。货郎沿门叫卖，有摇鼓的，有以小铁板相互撞击。一般出售日常用品及装饰品，也以物换物，收回棕皮、中药、蛇皮、鱼皮、牛羊皮及各种兽皮。^[30]还有一种长途行贩，从城中购货物，上山下乡叫卖，同时收购农副产品进城销售，有的还往返于城市与城市之间从事贩运。

“行商”是由经商者将其经营的货物主动运送到所需之处，以卖方向买方主动会合为特征。这种游动性交易形式的习俗，灵活方便，深受买方欢迎。许多城镇都以十分隆重的礼节欢迎远方的客商。一般的乡间村寨，货郎走乡穿巷，见多识广，给村民带来“外面世界”的信息，是文化和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深受村民欢迎。在宋元以来中国沿海港口迎接外国船队的到来时，也通常都像热闹非常，温州作为一个海商贸历史悠久的沿海城市，海商在历史上受到很高礼遇。据郑麟趾《高丽史》第三册《周伾传》载，温州人周伾咸平元年随商船赴高丽经商，被留。“初授礼宾省注簿。不数月，除拾遗，遂掌制诰……”^[1465]余文豹《吹剑录外集》记载宋史永嘉王德用赴交趾(越南)“其国王大喜，亲与宴会，出宫女佐樽，以用才艺而敏，给厚礼而留之……”^[1468]行商习俗的流动性赋予商业民俗以活泼生动的色彩。

随着商品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近代行商的经商形态又发展有批发商、收购商、转运商、中介商等多种形式，成为活跃市场的重要角色。在城镇，行商的活动仍然非常活跃，一些小商小贩定期到某地出售商品，有些则长期周转于几个地点，给市民的日常生活增添了不少方便。在一些偏远的山区和交通不发达地区，这种游动性的行商给那里居民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便利。对于行商的历史和民俗的考察，有助于加深对其性质和经营方式了解，为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2.2 坐商

坐商，古代通称为“坐贾”，也称为“积居”或“积著”，是固定性的经商方式，由“市”交易形态发展起来。坐商的经商地点、时间和售卖商品都是固定的，是由古代的市场体制所规定的。坐商的经商习俗，是在“市”产生之后才能出现的商俗形态。市场早期“坊市”制度的存在，工商业者在“市”中经营地点、时间，甚至经营品种的归类，都要遵守官方的统一要求。工商业者在市中的经营店铺被称作“廛”、“肆”，《论语》中有“百工居肆，以成其

事”^[31]，后又称为“店”或“店铺”。宋代以后，随古代“坊市”制度的解体，对于店铺开设地点、经营时间和经营品种管制有所放松，一般店铺的营业时间通常为白天，并根据各行业自身的特点，决定其开闭时间。从事夜间经营的主要为饮食小吃、客店及药店等。小型的坐商，多为定点摊贩，摊贩设摊地点大都为较为固定，并为各摊所公认，后到的商贩不得挤占。

温州坐商的历史发达，据《温州府永嘉县光绪三十四年实业统计表》清末永嘉县设店铺近一千七百家^[146]。温州的坐商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划浮船的商业习俗，兼有行商和坐商的两方特点。划浮船又名“摇浮鼓”。洞头渔港曾有人以舢舨创办海上流动商店，摇着橹，在港口出售日用杂货，俗称“划浮船”，又称“摇浮鼓”，摇船者为了引人注目，一边摇橹，一边还摇响手鼓。渔民有现金购买的，也有用鱼货换取的，也有赊账待下“风”捕鱼回来卖了再收钱。温州小型坐商摊贩有固定或流动两种，设在在人群来往多的街巷两旁设，出售水产品、海鲜、蔬菜、水果等各种货物。摊位所卖的货物多从商行按批价购进或农户手中成批收购，或批发或和零售。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摆摊经营越来越多，大量温州人到全国各地从事商品流通活动，温州的各种摊位遍布全国。

温州最为有代表性的坐商是南北货业，曾是温州旧时最大的行业，其中在南门最为集中，有“南门九间”之称。凡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民间信仰以及交际礼仪等，都得与南北货业打交道。南北货业，温州人叫果子店，就是南货店^{[30][46]}。它专营南北果品、土产特产。凡时鲜果品，瓶装酱酒，糖果饼干、虾子鱼生等都经销。南货店设有店堂、账房间、糕间、蜡烛间、栈房等处。人事组织有者大(读驮)、先生(经理)、账房(财务)、出关(采购)、伙计(店员)、出栈(总务、食堂)、学徒以及季节性雇用的蜡烛老司、糕间老司等约十五六人。老板一般兼经理，也有的经理全权负责，高坐账桌首座，眼观四方，观察顾客，监督店员。客商有货物运到或捐客来兜货，都把货样取来送给出关先生查样，如金针、红枣、红白糖等，每次都有斤把商品，不论你卖或不卖，样品都归出关先生所有。南货店的标价都用码子，即丨||川×女上≡≡爻，即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如红糖四角六分一斤，就写“×上”，生仁二角九分一斤，就写“||爻”。

温州传统商业店铺的售卖服务方式，主要可分为柜前服务和专人接待服务两类。柜前服务方式多为小卖店，杂货店及较大型的百货商店的售货服务采用，即在柜台上或货架上陈列商品，店员分工每人负责一片柜台，直接在柜台前招呼顾客、热情地推荐，介绍商品，并帮助顾客选购和服务，售卖商品和为顾客服务。温州经商店铺，都有一个柜台，如南货店、酒店、酱园等。一般是店堂三分之二作为柜台内，三分之一为柜台外，柜台外可放门板，也可站顾客。今日的一般店铺，也大多采取这一方式。旧时的某些专业商店，如绸布店、鞋帽店等一般是通常采用敞架售货、专人接待服务的售货方式。从顾客一进店门开始，就由一名售货员自始至终地跟随顾客到各个货架前选货。边介绍商品边陪着聊天，直到顾客选好商品，算账交款后，一直将顾客送到门外，并躬身道别。这种售货方式，便于使顾客与店员之间产生亲近感，在旧式的商业店铺中，很重视“拉主顾”，一个店员所认识的“老主顾”越多，就越会受到经理的重视。店员大多主动与顾客或者主顾建立关系，有时只要是来过一次的顾客，店员在第二次见面时就能叫出名字或称呼，这是商业店家招揽生意的“绝招”，生意场上称为“套熟”。

店铺的一般待客售货服务中，讲究说话和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顶撞得罪顾客，提倡

“和气生财”，注重售后服务，以拉拢主顾。商家“拉主顾”、搞竞争的主要服务促销手段之一，对于今日的商业服务也有可取之处。

温州坐商中的商业禁忌比较明显，店员站柜台，必须脸朝外，热情招待顾客，面向内，屁股朝外为大忌。学徒打扫店堂，一般中午一次，晚上打烊前打扫店堂内外和街道。扫地要往里扫认为这样才能把钱财扫进来。忌往外扫。在殿堂门口忌打哈欠、伸懒腰、坐门阶等，认为这样会挡住财神菩萨进门^{[30]155}。过去商店一般都供财神爷，俗称“招财爷”。其神为赵公明(赵玄坛)，现今多供关公作为财神爷，取其“信”、“义”二字，并祈求保佑发财^{[30]154}。店堂禁忌除却提高服务质量吸引顾客的合理因素之外，更多的是对神的敬畏。温州的日用小百货店，每天开门盼第一个顾客上门买红枣(和“红得早”谐音)，忌买茶叶(和温州方言“坐蚀”谐音)^[30]；货物价格忌标“36”(在温州方言中表示绝缘，不做回头客)。早晨开门营业忌退货，忌换零钱，忌遇乞讨(钱往外跑)；这些禁忌在今天坐商中仍有一些保留，温州坐商中的商业禁忌充分显示商家对于“利”的渴望与患得患失，根本目的是避凶趋吉。这些商业禁忌民俗事象承载着深沉的历史积淀，温州商业发展历史悠久，商业民俗积淀深厚，禁忌民俗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禁忌民俗折射出瓯越文化“离合的神光”——“重商”与“崇神”的内核，是瓯越先民在特定的地理历史条件下，适应环境求得生存发展的意识文化一种体现。

2. 21 温州老店

温州一些老店，历史悠久、经营出色、为公众所承认，被称为“百年老店”^[32]。主要有：

老店名	简介
金三益	金绪宝等三兄弟于 1859 年共同筹资 6000 银元，在鼓楼街开设“金同益”商号，专营苏杭湖绸缎。后来“金同益”改名“金三益”，为金氏三兄弟皆获益之意。“金三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生意日渐兴隆，几年后迁至五马街现址。温州有“金三益的绸缎恁”俗语流传，意谓事情、东西做得特别好。从创立之初一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金三益”都是温州乃至浙南地区品种最齐全，知名度最高的专业布店。
五味和	始建于清光绪八年（公元 1882 年），原是宁波慈溪商人杨正裕与同乡冯伯楨等合伙在鼓楼街开设的“五和”蜜饯店。清末书法名家梅调鼎在“五和”两字间增一“味”字，意寓甜、酸、苦、辣、咸五味调和，并题字“五味和”。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年），杨正裕之子杨直钦继承父业，在五马街现址开设“五味和”新号，五味和目前仍然是温州市区最大的副食品专营店。
温州一百	成立于 1950 年 4 月，其前身是创建于 1925 年并蜚声浙南的“博瓯百货商场”。它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保障供应、稳定物价做出不懈努力，在市民中具有极高的声誉。2000 年它通过国有资产战略性重组，麾下囊括了五味和、金三益、中百商城等 10 家零售网点，使商店从单纯“百货商店”转型为聚集国有商业网点、人才优势的品

	牌旗舰。
瑞安百好乳业有限公司	创建于 1926 年，是我国第一家乳品厂，创始者吴百亨为我国乳品工业的奠基人。百好乳业创办之初，其拳头产品“擒雕牌”炼乳，就与英国英瑞公司麾下的“飞鹰”炼乳，展开旷日持久的商标之战而一举成名。百好乳业此举开了中国知识产权官司的先河，为当时普遍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品牌扬了眉吐了气，这在涉外官司日益增多的今天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瑞安老字号李大同	创立于 1889 年，其创始人是瑞安糕点名师李瑞庆。他景仰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革命理想，取“大同”两字加上自己的姓作为店铺名。“李大同”的双炊糕闻名遐迩，又松又软，香甜可口，为糕点一绝。
浙江乳品有限公司	创立于 1956 年，其生产的数种规格的熊猫牌炼乳，不仅占有国内的最大市场份额，并且远销非洲、中东、东南亚，深受客户的好评。

建国后，温州一些老字号商店被国家贸易部授予“中华老字号”称号。温州“老字号”是温州宝贵的商业民俗文化遗产，需要认真加以研究保护，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为今天的温州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服务。

2. 22 温州典当

典当即当铺，是我国最古老的行业之一。典当业根植于封建社会，与社会底层平民百姓的生活联系密切，尽管其不免要盘剥求利，却也发挥便利生活的“济贫”作用。所当物品最初限于日常生活、生产中的各种物品。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其类型也在发生变化。当今社会，典当业“这种特殊的、适合本土文化传统的灵活的随机调剂设施”，^[33]本身所固有的调剂缓急的社会作用日益突出。“典当”最初是指以物作为质押借贷行为，一般认为中国的典当业始于南北朝时的佛寺储存钱财的寺库。唐宋以来“质库”则成为典当机构的名称之一，唐以后，开始出现名为“质库”、“柜坊”等的官营或民营的金融行业，与寺院寺库质贷并存。^[34]典当业在唐代的发展，主要依托于资本雄厚的僦柜，为经营存款和信托业务时兼营的业务。至宋代，遍布城镇的质库开始独立成行经营，具备形成专业行会的条件。明清两代商业的空前发达，明中叶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刺激典当业进一步兴盛。明清两季典当行在综合经营的同时出现了针对不同当物对象的专业性经营分工，经营管理的日趋条理化、规范化，典当业逐渐走向成熟。^[35]清末典当业盛极而衰，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经济状况恶劣等因素的冲击，典当业已处于前所未有的衰落和危机之中，当铺数量减少、当铺营业额减少、经营亏损增多，给普通百姓的金融借贷带来严重影响。清末民初，在钱庄、账局、票号以及国外资本和国内资本的银行林立情况下，金融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传统典当业，资本日渐减少，愈发衰落。^[36]

温州典当业历史悠久，宋嘉熙间值庚子大旱……乐清陈光庭典当不取息，民咸德之。（弘治《温州府志》卷十二《人物三》）^{[1]539}典当业在宋朝获得长足发展，并形成了历史上最早的中国典当业行会组织。明清两代是中国典当史上的兴盛时期，清乾隆初（约 1738 年），温州市就有点当铺，营业地点设在城内大雄寺巷，资金三万余两白银，典当物品主要为铜、锡、

金、谷物、家具、衣服。温州存典月息一封五厘(乾隆《温州府志》卷六《公署·恤政》)^{[1]539}, (《永嘉闻见录》卷上)清道光间文庙书院、育婴堂存典生息(刘煜《永嘉育婴堂碑记》。引光绪《永嘉县志》卷三五《庶政》。该碑刻于道光十三年)^{[1]540}。《过来语》载:“瓯俗典铺气息,比省会重三倍有余。如当钱三十五千,一月该利八百七十五文,省会五十两,八厘起息,一月只合二百八十文”(光绪《永嘉县志》卷三五《庶政》);记有清光绪间温州典当兴盛,温州文成会等存典生息。(孙诒让《算学书院章程》。瑞安算学院(后称瑞安学计馆)创办于光绪二十一年)瑞安县存典月息八厘。道光五年(1825)出现德丰当铺,宣统五年(1908),温州除了以上当铺外,又出现仁和、通济、公大三家。典当分“当店”和“代当”两种。平阳(含今天苍南)、瑞安、乐清等地均有当铺、代当。

典当是以物品作为抵押贷以资金,再收利息。代当系当店的代理机构或代理人。资金从当店领用或先行垫付,所收当物送挂靠当店。早期代当大都设于农村集镇。代当亦称“代步”。当期到后可延长10-30天。到期不赎,俗称“满当”或“死当”,可由当铺以其抵押物拍卖抵偿典当的利息,旧称“行息”。当店所当物品,主要是棉被、衣服、铜锡器皿、金银首饰等。典当金额称之为“当价”,按物品新旧程度、质量好坏给与估价,大约按现值当给50%左右金额,开给当票(即收据),作为取赎凭证。当票上写明典当日期、物品名称、数量、当价、金额、利率、手续费、典当期限等各项规定。当票上写的字体为“当店字”或“狂字”,防止仿照冒领自成一体。避免减轻和推卸损坏责任,而对所当物品在当票上乱加贬语,凡毛货必写“虫吃鼠咬,光板无毛”,一般衣服则写“油旧破补,缺襟烂袖”等;如铜锡器皿则写“废”等。当店的利息很高。当铺一般在店堂中建有七八尺高的(有些则柜高盈丈),带围板(即围栏)的大柜台,有别于其他店铺的设施,主要是为了安全、防抢,是由当铺营业的特殊性质决定。有些当铺大门之内,常陈列一座大屏风,这样有两个不同方向的进口,同时也起着遮掩隐蔽的作用。屋内还设有货架和库房。当店门口挂一方形“当”字木质红底字招牌,有些则直接书于墙壁上,以招徕顾客^{[30]144}。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铺曾被当作剥削制度革除。1980年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需求规模不断扩大,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经济的需要,典当作为一种辅助性的融资手段,对于方便人民生活、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自1988年2月9日,浙江省温州开设了首家当铺—温州金试典当商行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市相继设立了42家当铺,数量约占全国同业的定1/5。目前,在温州市已亮牌开业的有34家,另有8家虽经批准,但因各种原因尚未开张营业。温州的当铺除所辖洞头县外,已遍及8县(市)2区,其中温州市区有12家。^[37]典当行自有货币资本金外,温州典当商行营运资金的来源还有向金融机构借款和“内部集资”或向主管部门及一些企业单位借款。典当商行的经营范围,动产类以日用品、家用电器、金银饰品,有价证券、富余原材料、企业闲置设备及交通工具等为主;不动产主要是房屋。典当商行的典当期限一般规定为:起当期10天,不到10天提前回赎的按10天收费,典当期为3个月,期满不能回赎的,可在期满前3天内提出延赎申请,延赎期15天。典当物品的实际价值必须在100元以上,不足100元不受理,典当逾期不回赎的,作绝当处理,但可领取绝当价数30%的金额。典当商行的综合费率,包括服务费、仓管费、保险费等,一般为月率24%~36%,高于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低于民间借贷利率。商行对典当物品的估价方法:不动产一般按市价的50%左右估价动产质押物。典当业在发展中,一些典当行违规操作,超范围经营,1996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典当行管理暂行办法》，并据此对典当业进行了清理整顿。

2. 23 温州饮食店

饮食业主要包括饭馆和小吃店两类。饭馆又谓菜馆，以经营各色酒菜、包办宴席为主，小吃店多是面馆，点心铺、粥摊之类，经营主食或地方小吃为主。饮食店是城市消费生活的产物，也是我国饮食文化的集中体现。我国历史上的饮食业经营源于古代市中卖熟制主食或糖果小吃的摊铺，属于市中的“杂卖”行当。在上古时期，市场交易不甚发达，人民的生活也主要以自给自足为主，故《周礼》中有所谓“无鬻熟，无室市”^[38]规定。隋唐以前，只有商人客店才开店设座、在店中卖现成饭菜。或提供原料及炊具，供客人自办。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城市中普遍出现各种饮食店铺。据《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等记载，有“酒肆”、“分茶店”，小吃店和街头食摊等形式。酒肆以卖酒为主，兼卖下酒菜品；分茶店是较大型的饭馆，卖酒菜，也卖主食饭菜；小吃店卖日常小吃和风味食品为主；街头食摊则是流动的或临时的小吃店。此外，居民因“红、白喜事”等需要在家中摆宴的，街上“四司六局”提供代办服务。宋代，大型饭店为招揽食客，讲究门面装饰及店堂陈设。多高悬店牌，挂名人书画，安放奇花异卉，案桌餐具，陈设典雅。店堂服务分“前堂”用以待客，“后局”烹调前堂设有“食牌”（食谱）或“看菜”。在服务方式上，客进入座，由行菜者上前招呼，或送食牌纸笔，供客人点菜，或先上看菜。由客人点买，“行菜得之，近局次立，从头念唱，报与局内”^[39]，掌灶者按所报菜单，一一烹制，再由行菜送至客前，安箸斟酒，伺候服务，直到客人用完，柜前结账。小吃店简化为柜前买卖，入座食之。当时饮食业之盛如《梦粱录》中“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不置家蔬”^[40]。清代及近代时期，饮食业已成为城市中最为发达的服务性行业了。

温州在南宋绍兴元年，有待贤驿、来远驿。中外商船进港出海，均支送酒食。城内开设八仙楼、思远楼、众乐园。《荆钗记》有“思远楼前景无限，画楼歌妓颜如花”。众乐园“每岁二月开园设酌，众群欢会，尽春而罢”^[41]

温州近代的饭店，大体上可以分为大饭店、小吃店、摊店三种形式。大饭店以经营各色酒菜宴席为主，多取带“堂”、“楼”、“庄”等名目的字号，以显其气派。民国年间，温州的饮食业曾具有相当规模。开设有意大利（后改名华大利）、醒春居、郑生记、味亚、冰壶、乐园、松鹤楼、福字园、振顺馆，推出玉带海参、芙蓉蛎蚶、马铃黄鱼、炸银鱼排、锤于馄饨等具有地方特色的风味菜肴。^{[41]1743}这些大饭庄，店中一般分设雅座和散座，雅座招待包桌酒席，散座招揽零星食客。经营品种多突出本店的名点名菜，讲究选料纯正、精调细制、味正香浓，一般价格也较高，且技术保密。温州的瓯菜体系以海鲜为主，口味清鲜，淡而不薄，自成一体，独具风味。成为浙江四大菜系之一。小吃店主要是招揽一般食客，多以特色小吃和面点为主，以风味独特、价格适中，方便快捷为其经营特点，经营方式多种多样。温州风味小吃很多，有松糕、箬糕、马蹄松、米面、鱼丸等，约有四五十个品种。摊店则是其中之小者。此外，旧时城市街头，还有各种流动食摊的叫卖者，其主要分三类：一是以家庭作坊形式进行自产自销的小铺户，多以地方小吃为主；二是批发零售小食品的小商贩，他们一般从大饭店或糕点店批发食品，然后推车挑担到街上叫卖；三是由小吃店派人上街头摆摊叫卖。

温州饮食夜市在宋代就有，知府杨蟠的描述为“过时灯火后，箫鼓正喧阗，三十六坊月，

一般今夜圆”。明清时，温州夜市更加繁荣。清同治年间，方鼎锐《东甌百咏》诗云：“三更灯火映窗棂，宵市居然晓市同。夜禁七城都上钥，轻舟还是水门通。”^[41]¹⁷³⁹民国年间，温州饮食业有较大发展，一批上规模的餐馆相继开业。五马街等闹市区，夜间霓虹闪烁，满街通明。酒楼餐馆为夜市中最为喧闹的场所，一般持续到深夜。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饮食业夜市蓬勃发展。在最为繁华的地段，摊档紧挨，食客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温州饮食夜市，除了街头大排档、小吃摊，还有酒楼餐馆、饭铺茶座总数达上千家，形成菜肴、点心、饮品齐全，高中低档并举的格局。饮食业经营的传习，活跃了市场，丰富了市民生活，并推动了饮食文化不断发展。

坐商经商习俗延续至今，是现代商业经营中最为普遍的一种商业方式。坐商传统的经商方式，重视传承坐商民俗是提高商业文化意识的重要内容之一。

2.3 居间商

2.3.1 伢郎

居间商，就是中介商，在市场上为买、卖双方牵线搭桥，撮合成交，从中收取一定的报酬或佣金，本人一般不供交易的物品，民间称“牙商”、“掇客”、“说和人”、“跑合”等，现代则称“经纪人”。居间商的民俗是一种纯媒介性的商俗形态。

居间商最初由“质人”而来。^[6]¹²⁴我国最早的私人居间商，是汉代在牲口市场撮合买卖的“狙侏”，^[42]早期的居间商，介入交易，并无官府的印信文簿。靠熟悉市场行情与自身的诚实公正赢得买卖双方的信任。唐代以后，居间商被称之为“牙郎”、“牙子”或“牙人”，刘禹锡《观市》^[43]中有居间商在市场上垄断贸易，哄抬物价、撮合经纪、欺诈成交的描述，因而在《唐律疏议》^[44]中有规范居间商的市场行为律令。宋以后，据宋人李元弼《作邑自箴》卷2^[45]。《宋会要》绍兴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诏^[46]，牙人除了撮合商人买卖基本业务外，买卖奴婢、倩雇人力等都有专业的“牙人”，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官方也同时加强对牙人的规范与管理，除“官牙”外，还对“私牙”进行征税，发放“身牌”，以此控制和管理市场的交易秩序。居间商带有半官方的身份在市场交易中扮演重要角色。明清时，各地的商镇或集市中，“牙人”越来越多。^[47]当时明清官方一直对于牙商开业管理严格，需经申请结保，才可发放官方执照“牙帖”，牙商某种意义上行使官方的权利。一些信用较高，影响较大的牙商，接受客户委托，代为停居货物、代客收售货物，甚至掌握交通工具，代为雇车船人马运货。当时流传“牙行曾接客，宿店亦招商”^[48]的谚语。除此之外，市场上还有一批只从事一般的中介业务的规模较小的“私牙”。在清代的对外贸易中，还有一种特殊“官牙，”享有官方特许权，即“广州十三行”，^[49]是垄断对外贸易的中介。鸦片战争后，中西贸易规模扩大，“买办”应运而生，是属于受外国洋行雇佣的、特殊意义的居间商。在“买办”商的经营习俗中，居间的形式和特点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产生了“经销制”、“合伙制”、“佣员制”等经纪人形式。在近代资本主义贸易方式的影响下，商品交易所等一系列经纪商组织在沿海的一些大城市中出现。这种新的变化使得居间商的民俗形态也随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清代温州的牙户颇多，乾隆《瑞安县志》卷三《田赋·外赋》载：“瑞安县上则牙户二名，中则牙户一名，下则牙户一十一名。”^[1]⁴⁵³光绪《乐清县志》卷五《田赋·户口》有：“乐清县

中则牙户一十四名，下则牙户五十一名。”^{[1]453}

新中国建国前，温州最大的伢郎出在鱼行、米行和柴行。洞头海岛各主要渔港岙口，都有“伢郎”，为渔船(或渔家)联系顾客，推销鱼产品。生意谈成，要由伢郎司秤，由此向买卖双方领取“伢人钱”(总交易额的10%—20%的佣金)。柴伢郎收成不大，多数为老人担任，按货值收取2%—5%的佣金，当时还有牛伢郎、猪伢郎等，建国后恢复市斤砵码，还配备公平秤作为共同标准，伢郎也逐渐减少，目前已很少见^{[30]149}。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发展繁荣，商业交易发达，商业中介人的角色又在各个商业经贸领域中出现，称为“经纪人”，是“伢郎”习俗的新发展。现代经纪人有一般经纪人和交易所经纪人之分：前者是个体的，是为买卖双方介绍交易以获取佣金并按政策缴纳税款的中间商人；后者是按照《交易所法》的规定，具有一定资格，并向交易所缴纳保证金，代客进行买卖，以取得佣金的中间商人。以房产中介服务最为典型，温州房产经纪人的活动，从建国初期至今，或隐或显的方式，从未停止过。改革开放后，逐步放宽政策，允许经纪人介绍买卖，租赁房屋，房屋介绍所迅速遍布市区大街小巷，从业人员多人，经纪行为日趋规范，对搞活房地产流通、完善房地产市场体系起到积极作用，现在这类房屋介绍所，几乎遍布各个角落。居间中介服务也促进了经济发展。尽管这种中介居间服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背景下，采取规范化的管理和正确的引导，这种具有悠久传统的居间商俗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32 银背

温州民间借贷由来已久，《宋会要辑稿》第七册五九九二页载绍兴二十三年七月二日，温州布衣万春上言：“乞将民间有利债负，还息与未还息，及本与未及本者，并与除放。”^{[1]538}可见宋绍兴间温州民间已借贷。宋淳熙间温州借贷月息二至五分。《袁氏世范》卷下《治家·假货取息贵得中》：“假贷钱谷，责令还息，正式贫富相资不可阙者。……今若以中制论之，质库月息自二分至四分，贷钱月息三分至五分，贷谷以一熟论，自三分至五分，取之亦不为虐，还则亦可无词。”^{[1]538}明代永嘉灶民称贷应急，《东嘉英桥王氏族谱》文纪第四“夫灶之所业盐尔，今尽征折色，称贷应急，十室九空，往往穷迫逃徙，莫能为生”^{[1]539}，万历《温州府志》卷五《食货·盐课》：“又商人到场买盐，贫灶率先贷其银，而商人乘之以射利，数月之间，必取倍息。”^{[1]539}明末泰顺贫民倍利称贷，崇祯《泰顺县志》卷三《赋役·土产》：“第为钱粮追急或军租无措，遑遑贼余于桐山诸初，剜肉以医，及至耕耘之时，枵腹难以田，又倍利称贷于积谷之家，此民所以日益贫，实民隐之堪怜者也。”^{[1]539}清道光间瑞安农村多有借贷，《过来语》己酉（道光二十九年）孙君秀枝，自谓仙港一村四百余家，旧岁因歉收，兼之粮银日重，村人不续告贷请求者，只二十余家（八月十五日记）。^{[1]541}清咸丰间瑞安亲友贷钱月息八厘，《过来语》：癸丑（咸丰四年）十月初五日，到邑访（项）几山，贷钱卅千文，买谷备领右余米，票注甲寅十月廿五日，交卅钱三千文（已偿）。^{[1]541}

银背(也称钱中)，即信用中介是对地下钱庄或从事借贷活动者的一种俗称。温州农村的银背，在改革开放前，多以隐蔽形式从事融资活动。信用的中介人当地称之为“银背”，开始是以借者与贷者之间介绍人的身份出现。银背在当地具有一定的资力和信誉，又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活动能力，贷出者乐意把钱贷给他所介绍的人，借贷者也可通过他的介绍很快找到贷

款人。“银背”最初只向借贷双方收取介绍费、手续费改组保费，随着供贷金额的增多，逐步发展成为经营存贷、收取利差的“借贷专业户”，乃至经营挂牌或不挂牌的“私人钱庄”。在苍南县的钱库和宜山两镇，这种银背曾经有 20 余人，每人融资额达 10 万-30 万。80 年代商品经济迅猛发展，银背也相应得以迅速发展，活动日渐公开，参与人数逐渐增多，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以介绍费、手续费、担保费等名义向借贷双方索取收入。银背多为兼职，只少数利用私人资信和关系网，逐渐发展为职业银背，经营存贷业务，收取利差。有的银背实为不公开挂牌的“私人钱庄”，建立账册，制定收款与借款凭据，确定利率。

2.33 钱庄

据温州文史资料载，温州钱庄的设立很早，当时做买卖多以制钱计算，故称钱庄，后来以银两计价，又改名银号。清时银号和钱庄并存，光绪年间，有春昇、裕通、乾丰、茂生等四家，其中春昇、裕通、怡生与宁波、上海有业务往来。后来银号钱庄增多，高达数十家。一九一六年以后，温州市场益趋活跃，钱庄业务有了更大的发展，尤其是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可说是温州钱庄业的全盛时期。当时有“大同行”六十四家，“小同行”四十余家，仅以“大同行”的从业人员来看(包括资方和职工在内)就在七百人以上(平均每家十人以上)。每年平均放款额约一二百万元(平均每家以二十万元计)，行前街、纱帽河一带，钱庄鳞次栉比。1927 年前后，温州有钱庄 23 家，其中以洪元、鼎源、厚康、涵康等实力最为雄厚。钱庄业，以其营业规模分为大同行(有划汇权)、小同行、现兑店三种。现兑店以钱币兑换为主，兼营购票等业务。因为旧时银行仅收发钞票，不设汇兑存放。当时的钱庄操纵各行业之间的资金流通、汇兑存放以及利息等方面的业务。^[30]¹⁴³温州钱庄业到了 1930 年，就面临严重危机，发生轰动全市的“大倒闭”风潮。仅两年时间，原有六十四家“大同行”因亏蚀闭歇的竟达五十六家，只剩下厚康、洪元、鼎源、洒康、润余、聚康、廉昌、水丰等八家钱庄。^[50]

“私人钱庄”多是从银背中间产生的，是公开挂牌经营货币借贷的银背，两者只有发展和公开程度上的差别，二者都是公开经营货币借贷的。银背要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公开挂牌营业，需要得到政府的承认，取得合法经营地位。1984 年至 1985 年，温州地区先后有 20 多人向政府或工商部门申请经营民间货币，有四家即：苍南县钱库镇“方兴钱庄”、苍南县巴曹镇“巴曹信用钱庄”、乐清县乐成镇“乐成钱庄”、苍南县金乡镇的“金乡钱庄”(批准后未开业)获得政府批推发给临时营业执照。其中“方兴钱庄”为独资开设，其余几家为合资经营。1985 年下半年，由于关于金融机构的设立需经人民银行批准的规定下达后，私人钱庄停业清理，故其规模未充分发展。^[51]私人钱庄在建国后死灰复燃，并一度盛行，大量地吸收了社会游资，也平抑了民间自由借贷利率，在客观上还扶持了多家企业和商店的发展。私人钱庄是商品生产发展的新的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民间自由借贷的形式，农村出现私人钱庄的地方，大都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民间自由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这些地方经营上有了较多的选择机会，从事多种行业需要的资金多而迫切，同时，这些地区的收入增加，资金开始出现剩余，迫切寻找出路，为开办私人钱庄提供了客观条件。

私人钱庄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对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同时私人钱庄属民间借贷、受市场调节，经营主要着眼于短期的与局部的眼前利益多，考虑全局长远利益少，有的只顾个体资金安全和利润，不顾社会效益，容易使整个农村信贷规模和

投向无法控制，甚至可能成为滋生高利贷的温床，破坏农村金融市场，需加强管理和监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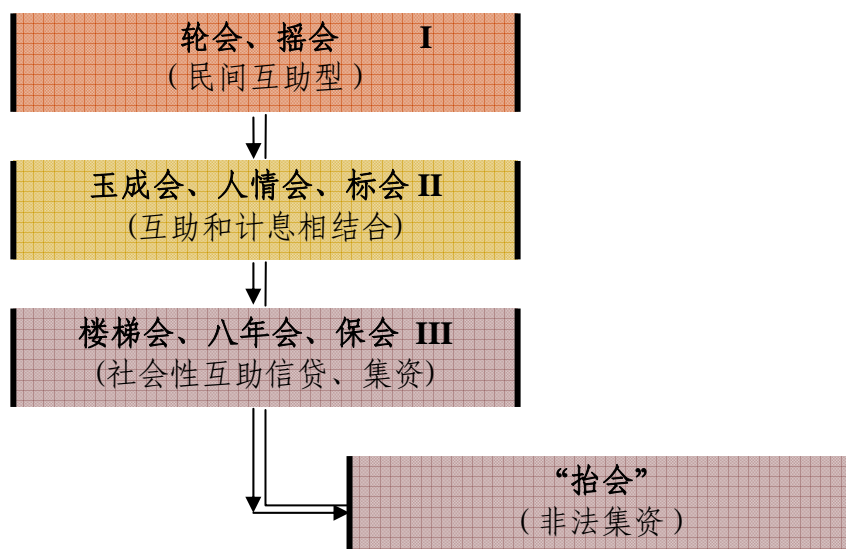
2.34 呈会

温州“呈会”也叫“合会”、“拼会”，是旧中国民间盛行的一种借贷形式，也是温州传统的民间经济互助民俗。^[52]最初单纯互助性质，家庭手工业和小商品经济蓬勃发展时，“呈会”在互助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社会生产基金的一种补充，为发展社会生产筹集和积累资金，用来解决资金困难的问题，从互助型发展到计息型，经改革、发展和完善，溶入股份所有制这一现代集资和经营方式中去。

呈会一般由发起人(会头)邀请亲友若干人参加，根据自愿原则，约定每月、每季或每年举会一次，每次各缴同等或不同的一定数量的会款(会金)，轮流交由一人使用，借以互助。会期时间不长，参加人数不多。会头先收第一次会款，以后依排序或摇骰子、抓阄(俗称“摸文”)等不同方式，决定参会者(会脚)收款次序。按交会款期限，分为小会和大会。小会每月或数月一次，大会一年一次，以小会为多。

温州民间“呈会”习俗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纯属民间互助型，其主要形式有轮会、摇会。轮会是按预先排定的次序轮流收取会金，故亦叫“坐会”。摇会通过摇骰子方式，确定收取会金次序，有“月月红”、“父母会”、“干会”等。“月月红”，亦叫“花儿会”，是一种数额较小的轮会形式，故俗称“会儿”。无利息，俗称“干会”。充分体现了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



第二阶段从单纯互助型过渡成为一种新的互助和计息相结合的借贷型。其形式除原有轮会、摇会外，又增加了“玉成会”、“人情会”、“标会”等形式。“玉成会”，也叫“人情会”，是一种既体现团结互助，又平等拿取低利的经济互助形式。除全部会金外，所含利息由会首付给二会，由此类推，会尾免收会利。“人情会”运用轮会形式，会主按规定基数收取与支付会员的会费。会员按缓急或抽签顺序收取会费。收取会费后的会员，每月按规定基数交纳会费；未收会费的会员，每月支付基金的1/2或1/3或2/3(基数比例是会主决定，由会员认可)。先收费的会员，支多收少；晚收费的会员，支少收多。“标会”是按投标利息方式进行呈会，投标利息最高者收取会费。会主每月按基数支付会费，会员中标者以后每月支付与规定基数相等的会费，未取会费的会员各支付基数与当月最高投标利息的差额。一般后收费会员收大

于支,而先收费会员支大于收,居当中会员收支大致扯平,这种形式较为普遍。

第三阶段除一般民间信贷互助互济的形式外,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如“楼梯会”、“八年会”、“保会”等,性质相近,但数额较大,必加利息,实际上成为一种社会性互助信贷,用于集资。“八年会”,又名“100月会”,七十年代出现,期限为100个月,1人1股,或1人数股,数人1股不等。除收会者外,每个会员要交给会主自己应负担的会款。“保会”时间也定8年,形式和8年会相似,但在收款上差异甚大。“楼梯会”在八十年代后发展起来,完全自愿、互助互利、赏罚分明,有条例、章程、规定,也叫“互助会”。头会会费由会东收用,从二会起,自报或抓阄决定,每月或每年一次,先收会费,拔会时略加利息,会主与会员收取相等会费,但支付数额各不相同,每个会员按期支付的会费差额呈梯形,等比逐降。目前,在“呈会”中运用较多的是“楼梯会”。

温州市有些企业建厂之初,靠“呈会”起家。在出国谋生的华侨中,也有靠当地同乡亲友,用“呈会”来筹集资金进行开店。温州民间“呈会”习俗与温州股份合作制形成,关系密切,股份制可算作对“呈会”习俗的发展。温州农村家庭企业发展初期,已出现少数以自愿互利的原则,以资金劳力联合,自发兴办合伙的股份企业,与温州民间“呈会”的许多共同点。由“呈会”发展到股份制公司超越家庭血缘关系的局限,有利于积累资金,深化分工协作,改善经营管理,具有承担民事责任能力。温州民间“呈会”习俗还被异化为“抬会”,1985年9月间,在乐清梅屿沙头村,出现了一种非法的利用“呈会”形式进行的金融借贷活动。后蔓延至全县、温州全市及外省、外县,酿成“会案”。一些金融投机者,以民间信贷形式出现,以高额利率为诱饵,采取种种诈骗手段,无限制地汇拢并肆意侵吞资金,造成金融危机,人们称之为“抬会”。1986年3月下旬被人民政府取缔。虽时间不长,但发生范围广,参与人数多,钱款额巨大后果极为严重^[52]。破坏了经济运行态势、损害传统社会伦理和社会信任。

研究商业方式的民俗,从民俗学角度去再认识商业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对其加以辨析,加以引导和管理,推动商业经营方式的发展和创新。

3. 温州商业会馆的民俗传承

商业会馆是一种带有地方乡土性的商人组织,出现于明,盛行于清。陈清义先生认为,会馆是明清时期易籍同乡或同业人士在客地设立的一种具有祀神、合乐、人举、公约等基本功能,并以多种形式和不同形态表现出来的社会组织。^[53]旧式商人多以乡土关系结帮外出经商,商品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商人会馆的出现。通过“会馆”招邀同乡共同开拓市场,开展商业竞争,在通商大埠营建房舍,作为同帮议事和宴乐的地点,同时为本帮商人贸易往来中提供住宿、贮货、交易的场所,扶植本帮商界势力,抵制外帮竞争,也办理同乡一些公益事业。在明代出现了许多会馆。各手工业、行业之所以组织公所或建立会馆,同业人员异乡做客,为了互相照应,救济失业、贫病、死亡或回籍旅费等等,带有典型的中国民俗文化的特征。温州光绪《永嘉县志》卷三五《庶政》有俞文漪《鄞江义冢记》“……汀人士目击心伤,谘于众,购地为义冢,俾得归士之安而无意外之患……”^{[1]446}载温州清乾隆间温州的闽商二百余人设义冢。这种传统思想传承至今,今天“同乡会”就带有这种性质。

温州商会组织出现较早,据王岳崧《温州商会试办章程》。温州商会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二

年正月廿二日^{[1]457}。特别是清代以来温州市区出现了许多会馆，如福建会馆、四明会馆、汀州会馆等。会馆按行业划分的为同业公会或友谊会(亦称“行会”)。1930年，温瓯江茶业公会，1931年温州市商业、机器、煤油等行业纷纷成立“同业公会”。按地区成立的同乡会馆称“公所”，俗称“同乡会”。民国时期建立的福建同乡会馆，就曾在本市东门创办过闽瓯小学。建国前，温州籍人士在上海、杭州、台北、香港等地，都有同乡会的组织。温州同乡会设有董事会，有正副会长，有组织章程，有会所，有会刊。其经费来源主要是产业收入，和抽分头即按进货价抽取若干会费也接受一些捐赠。

在国外的温州商会组织有：

成立时间	成立地	名称
1923年	新加坡	新加坡温州同乡会
1931年	新加坡。	温州同乡会更名为“温州会馆”
1946年	马来西亚槟城	温州会馆
1987年4月17日	日本川崎市	日本华侨温州同乡会
1992年9月17日	瓦伦西亚	西班牙温州同乡会
1995年2月5日	阿姆斯特丹	荷兰温州同乡会
1995年2月13日	-	旅荷温州永嘉同乡会
1995年2月26日	美国加州	美国加州温州同乡会
1997年	纽约	美国纽约温州同乡会
1997年3月16日	-	温州旅美同乡会

其他尚有美国浙江温州工商总会、旅法华侨文成联谊会等，名称虽异宗旨相近^{[7]429}。

旧时的同乡会(馆)侧重于保护同乡利益，不受外人欺凌，解决同乡在外遇到的困难等。现在的同乡会(馆)则把重点放在共谋事业发展上。应同乡之需要附设学校及其他关于教育事业。应同乡的需要，另立各种公益事件，对于各项所列事业，得请名人专家讲座。现在，国内经过改革后的新型商会或同乡会，帮助国内或国外一个地区的温州人，互相认识，沟通感情，发挥桥梁作用；同时在同乡会的协调下，共同研究发展两地经济，包括联合投资或合作，成立某种商业实体，扩大本身企业经济规模。现代同乡会的领导班子成员和会员，在年龄结构上趋于年轻化。温州商会组织是实力较强的温州海外组织，其本意要充分利用乡情、亲情、友情把在外地的温州人联络起来、抱成一团的，其民俗传承对于温州商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4. 温州商业标志的民俗传承

商业标志及其民俗形态实际上也是中国传统的商业广告方式之一。

4.1 叫卖与代声

以声音为标志形态称为“市声”，最为原始同时也最为普遍。商贩叫卖的“招徕市声”通常又分为“叫卖声”和“代声”两种。叫卖，“卖什么吆喝什么”，是商业宣传的最直接的方式，直接用口语传达所售商品内容、质量、价格等的一种商业广告(或称“商业标志”)习俗，

最早的叫卖,已难以考证。唐宋以来,有关记载颇多如宋人高承的《事物纪原》卷九《吟叫》^[54]、元代吴渭《月吟社诗·戴东老》^[55]等。明清以后,叫卖吆喝的习俗已相当普遍,而且形式多样。在民间的现实生活中,商人的叫卖,多以节奏鲜明或带有韵律感为特征,带有鼓动性和诱惑性。在长期的吆喝叫卖中,形成一些固定的腔调,多具有音乐性旋律,突出其物美价廉为特色,具有明显的商业竞争的性质。许多行业叫卖声的字音已走形变调,改变正音与调式,腔调合辙押韵,已兼具有副语言的音响标志的性质。

温州的手工业发达,各行各业的小贩尤其多,吆喝声丰富多样。补缸,收购废品,卖草药,卖米粽的等都用叫卖。卖草药的能唱一连串草药名称,“白脚网衣落地金钱、金银花笔、白马兰、淡竹叶、洋夏爬、六月雪买哇”“人参、当归、黄芪、杞子、生地要买哇!”收购破烂的,边拉小车边吆喝:“旧钢、旧铁锅、塑料、塑料鞋底有买啊!”补缸匠拉长声音,吆喝着“生一缸哎”等十分动听^[30]¹⁵⁰。现今这种吆喝声在城市已很少听到,农村尚存。

代声也称“货声”,以器物发出音响代替叫卖,代声器具存在较大的地区和行业差别。使用代声器具或招徕器乐的多为本小利微的行当,代声器具以打击物居多。代声可减少嗓音的疲劳,是叫卖声的延伸,同时某些特殊行业,如卖丧葬用品的行业,不便开口而采用代声。代声大多是适应流动性商贩的一种标志性商俗,传习久远,多有记载。如宋代吴自牧的《梦粱录》《夜市》元关汉卿《王国香月夜四春园》第二折^[56]《水浒传》第七十一回有^[57]清赫懿行《晒书堂笔录》^[58]。《燕京杂记》^[58]都有生动描述。

温州商贩的代声,主要有卖肉人吹角螺;兑糖客用手打糖的锤子和刀相撞击,叮当作响;阉猪客用吹短笛作为标志;馄饨担用竹梆;回收废旧物品的用小锣;算命的用摇算盘或拨弹三弦;货郎担专卖妇女首饰和针线,则用要拨浪鼓作信号等。叫卖和代声,在流动性小商贩中最为普遍的民间商业习俗,颇具传统文化色彩。至今不少商店也在沿用,在当今现代广告中的商业宣传,与传统的商业吆喝声所表现的追求完美舒畅之节律也不无联系,并日益成为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一种促销手段。

4.2 招幌

是“招牌”和“幌子”的复合式泛称,是为行业和店铺的经营标志。行商和坐商,都有使用招幌的习俗,坐商(如手工作坊、商业店铺等)更甚。作为招徕顾客的识别标志,是一种具有符号语言性质的标志语(副语言)形态。最早的文字招牌,只用于提示经营内容,如当铺高悬的“当”字,茶楼高挂“茶”字,还有其他如:“米”、“酒”、“药”、“烟”等。随着商业发展竞争加剧,招牌进一步广告化,多以四字一句,朗朗上口,容易记颂。“百年老店”、“三代世家”、“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商业招牌一种是店标标志即上标字号的牌匾,横放在店堂门上;一种是竖式招牌立在商店柜台上或放在柜台两头或包柱上,还有一种是距地3—5米高的冲天招牌,耸立于店铺门,使店铺很远处就能被看到。幌子,又称“幔子”,“望子”、“招子”等,是以商品实物、象征物或旗、帘等各种标识物来标示商家经营内容。这种习俗在中国产生较早,早在战国时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59]篇中就有的记载,另据清人翟灏的《通俗编》卷二十六《器用·望子》中所载^[60]酒家,多悬挂旗帘为幌的习俗,酒家档次可从其形式、内容,区分。旗帘则又称“望子”,最初是用布掇子竿头的一种店前悬挂式标志,多用于酒家或饮食店,随着商业标志广告的艺术化,到后来,旗帘上也多标有一些宣传性文

字或图案，此外，宋代的酒旗的升降还表示店家是否有酒出售。

在温州作为商业店家的标志的招牌和幌子，是其经营内容、服务档次和特色的重要标志。各行各业都有其传统的形式和挂幌的习俗，温州盛产海鲜，在在餐馆门口常用活鱼、活虾作标志；鞋店门口常放置大鞋子模型作标志；在客栈门口挂箬篱，打铁门口挂各种铁器，纸店门口挂大纸伞。医师和药铺门口挂葫芦或大膏药牌等；以灯具、旗帘做幌子，一般主要用于夜市的饮食小吃，到了晚上，比较醒目。有些夜间营业的酒楼、药店等也常爱采用。理发店门口用红黄蓝三色转环，客栈门口挂“安寓客商”或“宾至如归”等灯箱^[30]^[147]，等等。现代则大都用霓虹灯、灯箱、广告画、模特儿和橱窗设计，华丽而新颖。

4.3 商家字号与匾额

商家字号，是商业店家的文字名称，也称“店标”。是区别于同业店家与经营者的店铺标识，树立起店家的形象，确立店誉，具有独家专用的性质，构成我国商业标志习俗中的一个重要形态。在商家的字号中，最为常见的形式是以店主的姓氏为号，这也是店标名称的较原始形态，《梦粱录》中记载的当时临安城中陈家彩帛铺、舒家纸札铺、童家蜡烛等等许多店铺名称。一些合伙开的店铺，通常是用合伙人姓名中各取一字拼合起来作字号，有些店铺更换店东，但字号还要保留，在原字号下加“X记”字样^[4]^[107]，以示所有权转让。店标形态在中国发展的典型形态，是以匾额形式在店堂门前挂出的商家字号。它比一般的行业标志更具郑重性和商标化的特征，是专门的店家标识。商业匾额的最首要因素。宋代商铺名称，就已有起商号的习俗，《梦粱录》中所记南宋临安的药行、酒楼、文籍店之类^[4]^[107]。明清以来，商号用字的习俗成为我国独具特色的商业店标体系习俗。

温州的店铺十分讲究取名，认为店名好坏，会影响营业盛衰，喜欢取带有吉祥和兴旺的店名，不同性质的角度，有不同的取名。也形成一种俗规，如百货，南北货，布店、铜锡店，以及鱼咸店等，大都取带有盛、大、源、丰、进、兴、和、公、昌、益、顺等，不但在文字上要取雅意，而且多使用各种吉利字眼，意在用吉利的谶语，保佑生意兴隆，带有明显功利心理。其字号取字也多如清代学者朱彭寿在他的《安乐康平室随笔》编成一首七律《字号诗》：“顺裕兴隆瑞永昌，元亨万利复丰祥。泰和茂盛同乾德，谦吉公仁协鼎光。聚益中通全信义，久恒大美庆安康。新春正合生成广，润发洪源厚福长。”^[61]

在商号取名的格式上，传统形式以用三个字者居多，便于传颂。如金三益、同仁合、五味和、葆大、成大、久大成、陈同源、成日顺、新福兴、广仁昌、广源和等，以示财源茂盛，和气生财，买卖公平，童叟无欺之意。澡堂常用“池”，饭店酒馆喜用“楼”，理发店喜用“厅”。中药店大都取“堂”，如同仁堂、庆裕堂、大生堂等，也有以店主姓名作为店名的，如伯亨药房等。在一些历史悠久的传统行业中，商号用字也暗示行业的某些特点。不仅仅是店家名称的标志，同时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容。有些名店的命名，还含有一定的掌故或趣闻，某种意义上来说，商号是一种广告。财力雄厚的店家，对于商号牌匾的用料、书字及装饰，也是十分讲究的。铺门前正中的高处，有用镀金文字或金箔包装的“金字招牌”，挂店铺左边，则称“青龙招牌”。牌用木刻，并以名家题写店名为荣，常用的牌匾质料有木制、石制、钢制等，其制作的工艺也颇有讲究，请名人题字，用金漆大字涂写等，突出华丽、庄重的特点。商号牌匾，不仅是店标的形式，还具有一定文化艺术观赏价值。商家字号的习俗，也是我们今天

发展社会主义商业文化所理应予以关注的重要内容。

5. 温州商业语言民俗传承

5.1 商业秘密语

在商业交往中经常使用的专业语汇逐渐习俗化形成商业语言的民俗。在商业交际用语中,反应出传统的民俗心理的某些特征。如民间“语讳学”的特征和某些语言禁忌等,温州店铺希望早晨开门卖出的第一份货物是红枣,忌茶叶^[30],因为温州方言中红枣和“红得早”谐音,茶叶和“坐蚀”谐音。粤语中因“8”与“发”谐音,“8”就被人们看作是吉利的象征,这原本是广州民俗的心理因素现在都已被全国普遍接受,凡是有“8”的数目字,如电话号、车牌号、房间号等,人们争相索求,以至于代价高出正常几倍。在一些商品的命名上,以逆向语言禁忌(即不是从反面禁止,而从正面提倡)的方式来命名的习俗也在我国流传广泛,特别是在饭店的菜品命名上,尤为突出。均与民间语言民俗中的语讳有关。

商业秘密语,是商人在行业集团或群体内部通用的行业隐语,即“隐语”、“行话”、“行业秘密语”,又称“切口”。在商人的“切口”隐语中有通用“切口”和专用“切口”两大类。商人通用“切口”为一般商家通用隐语,保密性已不太严密,有些已成为民间惯用语或习惯称呼。凡此种种,成为在商业群体内部颇具民间特色的语言习俗。当行专用“切口”,保密性严密的专业隐语,非本行甚至非本地的同行商人,一般都难以知晓其含义。

温州各行业均有一套暗语(切口),有的是共同使用的,有的是南北货业所特有的。常用的暗语有:顾客叫做“来宝”,掮客叫做“网儿”,意思是:顾客是游鱼,掮客是鱼网,兜揽生意如捕鱼入网。单包(水客)叫做“走水”,价格叫做“西贝”,现销叫做“王见”,赊销叫做“见余”,赚钱叫做“油水”,亏钱叫做“赔本”,秤叫做“横儿”,多叫做“双夕”,少叫做“点卜”,回扣叫做“耳朵”,暗中拿佣金叫做“割胡须”,暗中抬价叫做“戴帽”,并以正、竺、春、罗、语、交、皂、穴、旭、针十个字,隐射一至十数字,等等。南货店的标价都用码子,即丨||川×女上≡≡文,即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如红糖四角六分一斤,就写“×上”,生仁二角九分一斤,就写“||文”。南货店的标价都用码子,即丨||川×女上≡≡文,即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如红糖四角六分一斤,就写“×上”,生仁二角九分一斤,就写“||文”。货物名称也有暗语,如红枣叫做“红面”,黑枣叫做“黑面”,莲子叫做“播盘儿”,螟脯叫做“蛙螟”,木耳叫做“耳朵”,香菇叫做“雨伞”,白糖叫做“两点”(当时销火车白),红糖叫做“单个字”,冰糖叫做“单点”,火腿叫做“琵琶琴”,金菜叫做“条儿”,发菜叫做“头发”,折叠叫做“蒲扇”,瓜子叫做“开月”,柿饼叫做“帽头”,虾尾叫做“秤钩”,花生叫做“麻脸”,皮参(海参)叫做“戒方”,等等。温州典当称袍子为挡风,马褂为对耦,长衫为幌子,马夹为穿心,皮袍写成“皮天”,玉石写成“假石”,花梨檀木写成“紫木”。狐皮、貂皮为“大毛”,羊皮为“小毛”,金刚钻为“耀光”,珠子为“圆子”,鞋为“踢土”,帽子为“遮头”,古画为“彩牌子”,古字为“黑牌子”。

同业中还沿用一些“吉利”语,这对招徕生意有作用。在旧社会里遇婚庆喜事或逢年过节,宴客送礼,人们都喜爱南北果品。这些果品都有它的吉利语,如金菜叫做“金针”,粉丝叫做“银丝”,核桃叫做“对合”,莲子叫做“和合”,红枣叫做“红早”,李干叫做“嘉庆子”,

笋干叫做“节节高”。如逢婚礼，大都以元枣、花生、桂圆、莲子为礼品，各取其中一字，以其谐音“早生贵子”，博取顾客的好感。(温州文史资料第六辑)^{[17]167}

商业秘密语因行业禁忌、避讳，或内部生意和技术保密需要而传承，同时也具有蒙蔽顾客的作用。民间商业秘密语中交织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凝聚多种社会文化现象。商业秘密语作为一种的文化符号和载体其传播、载录和反映着民族民间的文化现象。商业秘密语是考察传统商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可以了解到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市俗消费观念、价值观念及社会风尚的一般概貌。今日的商业生活中，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信息传播方式的进步，传统行帮垄断商业的方式已被冲破，各商业行帮的行话和秘密语已逐渐衰落。在日常生活中，仍有印记存在。

5.2 商业谚语

商业谚语反映商业经营者在经商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传统商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商业谚语表现的内容较为广泛，对商业经营和商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反应。温州的经商谚语，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商论：反应出温州重商的传统“乌乌店，胜过百亩田。(乌乌：冷冷清清)”，做生意要把握门道“劈柴覘纹路，生意覘门路。”，做生意对于人的因素的重视“九等生意十等做。”“有生意，吃伙计。(靠伙计帮忙)”，“做生意要本，做事干要狠。”对于生意的竞争的客观性的认识“讨饭生意赶狗难。”^[62]

商务：反映商业中的一些交易规律。加快货物流通带来更多利润“卖头勿卖尾，卖快好赚钱。”要把握市场，对于风险要有认识“只卖的行情，卖勿的人情。”“有心开酒店，勿怕赊酒钱。”和气生财，提高服务，力求双赢“人歇我开，和气进财。”“和气生银，吵嘴失金。”“钟馗开饭店，鬼也勿上门。”“暴利勿取，折本勿做。”追求利润“杀头生意有人做，折本生意有人做。”多比较，多总结，重视适度利润原则，把握顾客心理，合作原则。“货问三家，事问三老。”“走勿尽天下路，吃勿尽店家亏。”“人覘坏，佛覘盞，买货覘奂堆。”“一个便宜，九个爱。”“一门生意二门做。”“买卖好做，伙伴难搭。”^{[62]776}

商德：重视信誉“金字招牌勿落地。(讲信誉)”做好广告宣传“不吹螺，谁晓得你卖肉。”讲求职业道德“心正称才平。”注重货物对路适销“百鸟吃百虫，百货中百客。”“百货中百客，蹩脚牛娘卖牛客。”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本“经一道手，脱一层皮。”注重把握商机“生意场中无父子，见财勿发是孱头。”“俏货勿愁销。”“货对货免罪过。”“只怕肩头没有货，勿怕脚下没有路。”“价倒如山倒。”^{[62]781}

商贩：对于商贩心理的把握很是传神“勤力丐儿懒行贩。”“挑石灰见勿的卖面的。”“张网人盼南流，小商贩盼称头。”^{[62]785}

商业谚语是商人经营经验的精炼总结，与历史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业谚语的科学性和知识性，指导商业经营行为和社会实践。商业谚语简练生动，以其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商业谚语寓意深刻，引人深思，具有不可忽视的宣传教育作用，从这些经商谚语的思想内容，在达方式及其发展变化中，能够使我们了解我国传统商业发展的道路，也可以从中窥视民间商业生活中的某些奥秘。

下编 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研究（下）

1. 温州商业民俗的特点

流动性是商业的一个本质特征，用于交换是商品的本质属性，交换的行为使得商业的发展趋于共性化。商业民俗趋同性的特点在相互模仿的基础上产生，并在商品流动中突显出来，趋同性与区域性特质水乳交融不易分离，同时由于区域的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促使商业文化区域性的个性特征渗透在商业文化的共性之中。

1.1 温州商业民俗渗透着区域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

温州区域地理自然条件对于商业民俗的决定性影响。温州的地理条件“七山二水一分田的”，人多地少，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差，同时温州地处东南沿海，海产品，林业副产品丰富，以手工产品以及从事商业来弥补农业的资源不足，其用于交易的商品来自海洋、平原和山地，带有明显的多样性特点与该区域地理自然条件的多样性保持高度一致。

在温州的集市分布也体现出温州地形特点的影响。温州城区分东南西北四隅，经过长期商业活动的实践，根据地理位置、交通情况和方便同类商品集散交易，约定俗成，形成了许多相对集中的商业区。温州城区五马街是繁华的中心区，商店密布，绸布、百货、铜锡器皿、中西药、银行、钱庄、菜馆等的集中地。东门靠近瓯江过去以山货、南北货、鱼行等为多，闽货和西楠溪货物都在这里设代理处。南门外以水果、茶、柑、棉纱、伞骨等商肆为多。小南门外靠近会昌湖和南塘河，水上交通方便，以米行、鱼行、内河航运、锯木等为主，温州至青田的糖行也在这里设店经营。因为木材、山货多来自江上游，并靠木筏装运，西门外以上水木行、下水木行、山地货行以及木炭、水产等为主；麻行外则以竹业、炭行居多；朔门外以内河航运、报关、鱼行、木板、竹器、海鲜为多；康乐场的钢丝、铅丝、帆船用品；城西街大多为旧家具；府前街大多为书店、照相馆、银行等；还有一些专业巷，如卖鱼巷、打绳巷、打铁巷、打蓬巷等。

商业方式上也体现出区域的地理环境特质。温州沿海行商，交通工具多用船，货物也多有海产，具有海洋性的特点。旧时洞头海岛没有固定的农贸市场，农副产品都是采用流动的走乡串户叫卖方式销售。贩卖鱼货者，卖的大多是当日捕捞的新鲜鱼货，走乡串户叫卖。俗称“担鲜”。此地小型的行商“行贩”，以流动性经营为主，挑着货担到街巷叫卖，多为豆腐担、鱼鲜担、水果担、缸罐担、料货担、粉干担、索面担、土草药担等等。此外还有修雨伞、补鞋、打小铁等小手工业行贩，靠肩挑手提，走乡串户，沿村叫卖。一般交货收取货币外，也有以货换物的，加以麦换索面、以谷换百腐，以米换米糖等，有一种是货郎担，亦叫“卖销客”。靠肩担、手提到各乡村，流动售货。货郎沿门叫卖，有摇鼓的，有以小铁板相互撞击。一般出售日常用品及装饰品，最受山区妇女欢迎，同时，也以物换物，收回棕皮、中药、蛇皮、鱼皮、牛羊皮及各种兽皮。还有一种长途行贩，从城市购货物，上山下乡叫卖，同时

收购副产品进城销售，有的还贩运于城市与城市之间。温州居间商也以本地出产物品的中介为主，旧时最大的伢郎出在鱼行、米行和柴行。洞头海岛各主要渔港岙口的鱼伢郎，木材交易的柴伢郎，当时还有牛伢郎、猪伢郎等。

商业标志中，温州商贩的代声如卖肉人吹角螺带有鲜明的区域环境特色。服务方式习俗中，餐饮业区域环境特征尤为显著，温州的瓯菜体系为浙江四大菜系之一，以海鲜为主，口味清鲜，淡而不薄，自成一体，独具风味；小吃店多以特色小吃和面点为主，有松糕、箬糕、马蹄松、米面、鱼丸等，约有四五十个品种，这些食品与区域的多样的地理环境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商业民俗中多有商业禁忌多和财神崇拜信仰相关。温州民间风俗中，素有鬼神信仰的传统，“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63]温州鬼神信仰原因复杂。区域地理因素是一个重要原因。地少人多，仅靠农桑不足以养活众多的人口，更不能致富。严峻的生存现实迫使人们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资源，从事手工业、经商、渔业、海上贸易以求生存发展。对于温州先民而言，从事商业(包括海上贸易)和渔业不再是传统农业社会中从事农桑的附属与补充，而是一种基于生存本能的需要。在海洋和商业中讨生活比农商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是促成温州多鬼神信仰的一个根本原因。

1.2 温州商业民俗中商业和手工业结合紧密相辅相成

温州商人有销售网，也有加工基地，同时经营范围很广，从日用杂品到高科技产业，一应俱全。我国手工业与商业的产生，密不可分，相辅相成。我国手工业产生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两千二百年至公元前一千七百年间，当时工业品制作都已是“很精了”^[64]。在殷商时期，手工业的已经成熟和专业化，于手工业品的突出和发展，使得殷都成了当时的“工业中心”。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品的不断增加，促成交换的产生与发展，先是同地交换进而异地交换。交换的发展又推动运输工具和交换货币的改革。我国古代的工商业，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工业品品种繁多，质量很高，对外行商业贸易也更为活跃，规模更大，在世界上影响甚大。到了明清时期，又发展了海岸商口，对外贸易更频繁，而国内的发展，又促使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温州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历史悠久，手工业中以陶瓷业、造船业、纺织业和矿冶及金属制品业为代表。陶瓷工艺历史悠久，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晋朝。^[65]唐时瓯瓷工艺精美，唐代诗人盛赞缥瓷^{[1]270}，到了宋朝，温州瓷器远销国内外^{[1]270}明代永嘉、泰顺出陶瓷^{[1]270}清代平阳蕉滩、顺溪陶瓷传家^{[1]270}，清同治间泰顺洪日等地出陶瓷^{[1]271}，清末永嘉县陶瓷出品四十余种^{[1]271}。

温州在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就“以船为车”^{[1]272}三国吴置横屿船屯^{[1]272}，晋代东瓯舟船济江泛海^{[1]272}，唐贞观间江南十二州造船欲征高丽^{[1]273}，宋天圣间温、台打造澶州浮桥用船^{[1]273}，宋元丰间温州实造漕船、官舟^{[1]273}。宋元祐间温、明岁额造船六百只^{[1]273}。宋绍圣间请假温、明州运船给用^{[1]274}。宋崇宁初导洛货物场拨借温州运船^{[1]274}。宋政和间移温之船场于明州^{[1]274}，北宋时温、明州置造船官^{[1]275}。宋绍兴末福建依蒲门寨船样造船^{[1]276}。宋隆兴间、明、温等州造海、江船^{[1]276}。宋嘉定间温州打造海船费^{[1]278}。元朝至元间温州造征爪哇船^{[1]278}。明初浙闽濒海九卫造海舟御倭^{[1]279}。明初温州造巨舰如履平地^{[1]278}。明宣德间温州造漕运海艘^{[1]279}。

清同治间温州造快蟹哨船、龙舸船^{[1]280}。清温州造船厂额造船九十九只^{[1]280}。

在晋代温州已有鸡鸣布^{[1]283}，唐代温州土贡布^{[1]284}，宋嘉定间温州有机织户^{[1]284}，元、明温州置织染局^{[1]284}，明永乐间乐清产、贡帛之品^{[1]285}，明弘治间温州出现为人分纺分织^{[1]285}，明代温克（缙）丝之名遍东南^{[1]285}。明弘治、嘉间温州织染局岁造织品^{[1]286}。明隆庆间乐清织品众多^{[1]286}，明万历年间双线布、斜纹布独为他郡最^{[1]286}，明代平阳布成早得管债偿^{[1]287}，明代瓯绸等自可单行^{[1]287}，明末泰顺纯葛为布最佳^{[1]286}，清康熙间纺织工艺更为进步，“夏布曰腰机，冬布曰双梭，最细又有吉布，或称吉贝，失其制”^{[1]288}，清乾隆间平阳夏绩苎，冬纺棉^{[1]288}，青嘉定间瑞安出三港纱^{[1]288}，清道光间温州丝绸制定行规种种^{[1]289}，清代永嘉妇女竞买红花染布^{[1]289}，清代瓯绸算湖绉杭绫难比^{[1]290}，清代的双纱布为女工之最善者^{[1]2889}，清代温州拷纱制尤工^{[1]291}，清光绪间永嘉县有冻绿布^{[1]291}，清末永嘉县年产土布四十余万匹，年产丝绸三千匹，麻类五万七千元^{[1]294}。

唐代永嘉安固产铜^{[1]295}，宋元祐间乐清铸成巨镬^{[1]295}，宋元祐间永嘉铸铁井栏^{[1]295}，宋代温州南溪、潮溪产铜^{[1]296}，宋代温、台铸造铜器尤盛^{[1]297}，宋代温州产铅^{[1]297}，宋时瑞安县有矾石^{[1]297}，明初温州平阳已产矾^{[1]298}，明弘万间、瑞安、平阳、泰顺、永嘉淘砂炼铁^{[1]302}，清代永嘉县出磁石、铁砂^{[1]302}，清康熙间平阳莒溪铁矿岁产五万斤^{[1]303}，清末孙怡让组富强矿物公司^{[1]304}。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促成温州发达的工商业传统和“百工之乡”的产业传统。漫长历史中形成了温州比较发达、门类齐全的手工业和众多的小商小贩，为发展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提供了大量传统技术和能工巧匠，造就了大批善察行情、经营有方的生意人、购销员，生产经营小商品因而具有独特的优势。

在五十年代中期对个体手工业和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尽管采取了简单取缔的作法，但在二十多年里，温州一直有不少人自发地重新从事某些个体经济活动，以解决就业和生活的问题。躲避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酷打击，大批人被迫外流，到其他城市以弹棉花、修鞋子等为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以后，在农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以家庭和联户经营的民办工业同专业市场、农民购销员和民间信贷相结合为特点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给当地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温州农村经济的发展^[66]。今日温州人不仅善于经商，更善于办厂，温州商人有自己的销售网，有自己的加工基地，他们的经营范围很广从家电到服装，从零部件到成套设备，从日用杂品到高科技产业，样样俱全。擅长把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从办商业开始，很快转入办工业，开拓了一条具有温州特色的商业带动工业之路，是成就著名的“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1.3 温州商业民俗中温州商人性格中的两面性

流通是商业的本质特性，促使商业呈现一种趋同化的倾向。与此同时区域的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的因素的作用使其呈现区域的个性特征。两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促使温州商人的性格中呈现较为明显的两面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31 创造与保守

温州地少人多，从事传统农业的自然条件贫乏。在求生存的第一推动力下，温州人在传统农业之外积极开拓，手工业和商业成为其必然选择。温州手工业和商业历史悠久。温州商人的模仿创造能力在历史上已有充分体现。“故地不宜桑而织纴工，不宜粟麦而粳稻足，不宜漆而器用备”（《永宁编》为南宋陈谦成于嘉定九年。）^[112]“……君子尚文，小人习于技巧妙丽。”（弘治《温州府志》卷十九《词翰一·记》。林泉生《思远楼记》，作于元末）^[112]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温州“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精神及其运作方式，脱颖而出众多的中国“第一”：中国第一批农村专业市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家私营银行、中国第一个由地方集资为主的机场、中国第一个在美注册的农民私营企业、中国第一条股份合资建设的铁路……！一系列的“承包”事件和这众多中国“第一”交相辉映：乐清农民南士木以“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归承包者，经营权归南士木”的“土地二权分离制”承包了柳市镇后街村85户农户的107亩土地，有效地抑制了部分农田荒废的局面；年仅25岁的龙港农民王均瑶，承包了长沙至温州的航线，开启了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的先河；平阳企业家章烈成承包了开发南麂列岛的“蓝色工程”，在这个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掀海淘金”；文成的个体户王荣森一举包下延安地区30口油井的开采权，显示了温州人的惊人胆识和魄力；温州乌鲁木齐专线联合体和中国铁路对外服务华东公司联合开辟全程长达一万多公单的国际快运铁路专线，促成中国铁路运输营运的重大改革……^{[7]341}

虽然温州的创造精神已经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实绩，但是保守滞后的思维模式却使其“既得珠玉难得全宝”，主要表现为“宁为鸡头”和“小富即安”。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出现强强联合的情形。如上述温州各行业，仍是中小企业林立，大企业稀少，即使在风头最劲的鞋服业和低压电器中形成的企业集团，与国内的大公司、大集团（如海尔、长虹、杉杉、雅戈尔等）尚有一定的差距，和一些跨国大公司的差距更其遥远。温州，在企业集中、产品同构、企业数量众多的情况下，行业中较大的一些企业仍然未能走在一起，还在各自“苦战”“拼杀”，尽管社会各界对企业间联合的呼声很大，但实质上企业仍然选择了自我发展的道路。^[67]做一个小老板比做一个副总裁更有吸引力。温州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使得温州人很少接触现代市场经济，眼界不够开阔，偏重近期效益。温州民营企业的市场取向大多趋于短平快，现得利，在其经营的企业获得一定成功并开始致富时，便不再有投资和发展事业的冲动，开始追求一种安逸的物质生活享受。一方面温州的民营经济是从农村萌生和发展起来的，农村的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的经营者大都文化程度不高，一般只有中学程度，甚至小学尚未毕业，在克服了自身教育和文化程度的先天不足和传统农民的一些局限，显露出经营决策方面的成熟性和大局观，以及较强的环境适应性和应变性的同时，也极少能从宏远的眼光来把握将来。

1.32 诚信与欺骗

商人重在逐利，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史记·货殖列传》“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68]温州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使得一些温州人

眼界不够开阔, 偏重近期效益。有些行贩, 为了图利, 往往充假作弊, 如卖鸡鸭, 或向鸡鸭肚里灌水, 或灌以泥沙, 使顾客误以为鸭肉肥嫩; 卖黄鱼, 在鱼皮抹黄梘水, 当“金子黄鱼”卖; 卖抢蟹, 削蟹盖角, 涂“吊红(一种红色柿子)”充红膏抢蟹; 卖蜻子, 用水养过夜, 再涂上泥出售; 卖甲鱼, 用手指揪死甲鱼后腿, 甲鱼受挤压伸头, 顾客误为“活甲鱼”等等。有的行贩在秤杆上作弊, 如秤纽下面嵌石头, 或在外秤纽装二道细绳, 这些都能使自己多获利, 顾客吃亏。鱼伢郎过去都有“报大秤”的陋规, 有以 120 斤、150 斤、180 斤甚至 200 斤的称率报码计算货值, 以吸引顾客上门, 提高本鱼行的所谓声誉, 表面看鱼价提高了, 其实是贬低货值, 显然都是渔民吃亏, 知情者慑于鱼伢郎威势, 也不敢开口。^{[30]149}温州商业成走过一段弯路, 在利益驱使下, 制造假、冒、伪、劣商品, 他们制造的假冒商品几可乱真。改革开放以来, 一段时间全国谈温州货色变, “一水衣”、“一日鞋”和劣质低压电器、假冒商标品牌等等在全国不少地方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甚至形成了“温州=假冒骗”的概念。甚至有“温州是瘟州, 骗子多, 假货多。”“十万推销大军是十万个细菌”, 他们“行骗全国, 行贿全国, 流毒全国”等较为偏激的评价。1986 年, 杭州武林广场火烧温州劣质皮鞋的事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很多地方公开宣布拒绝温州产品……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 政府加强积极引导规范, 重视长远利益。温州市委、市政府于 1994 年旗帜鲜明地提出“二次创业”、“质量兴市”, 指出: “质量是温州人生命! 质量上, 则温州兴; 质量下, 则温州衰。”通过查处、打击、引导、发展等一系列措施和“358”等工程, 再扬温州优势, 再塑温州形象, 再展温州雄风。广大业主也充分认识到“人要脸, 树要皮, 名声是第一财富”的道理, 痛改前非, 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并进而产生了一批名牌产品、知名企业和著名的企业家。对此, 温州市前市委书记张友余曾深有感触地总结说: “初始阶段不完善, 发展过程很难堪, 负而效应总难免, 问题就在怎么看, 关键在于怎么干。”^[69]

1.33 合作与排外

温州商业中的合作精神体现在温州的商会发展历程中, 还体现在温州的民间呈会习俗中。温州在改革开放后, 异军突起, 多得是靠自力更生的自我挖潜力的精神。据王岳崧《温州商会试办章程》^{[1]457}。温州商会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廿二日, 光绪《永嘉县志》卷三五《庶政》有俞文漪《鄞江义冢记》载温州清乾隆间温州的闽商二百余人设义冢。^{[1]446}我国在明代出现了许多会馆。各手工业、行业之所以组织公所或建立会馆, 主要是鉴于同业人员都是异乡做客, 为了互相照应, 救济失业、贫病、死亡或回籍旅费等等。带有典型的中国民俗文化的特征。建国前, 温州籍人士在上海、杭州、台北、香港等地, 都有同乡会的组织。全国各地较大的城市都有温州人经营的温州街、温州村或温州城。100 多万温州人活跃在全国各地。哪里有市场, 那里就有温州人; 哪里有温州人, 那里就会有市场。温州人把在全国办市场的灵活形式延伸到国际市场去, 到异国他乡打拼天下的越来越多。据温州市侨办估计, 目前在国外的温州人已达 30 多万人, 多数是改革开放后尤其是 90 年代后出国的, 其中, 在法国约有 7 万人, 意大利约有 5 万人, 美国约有 5 万人。(《温州侨乡报》1998.5.4)温州商业的市场扩张态势有很大一部分得益于温州人的团队合作精神。

但是温州的合作的团队精神又是相对的, 温州地处东南一隅, 虽然开发较早, 但山水的天然阻隔和政治的边缘状态促使这单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 温州区域文化深受温州

封闭性的地理交通状况和历史的综合影响下。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温州的团队的精神也是立足于血缘，家族，地缘的基础上，具有排外特质的。过去的二十余年里，温州人凭着坚韧和刻苦，在交通不便，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走南闯北开辟了一条“小商品，大市场”的康庄大道。温州人拥有许多自恋的资本，然而，这种自恋的资本一旦演化为自恋情结，尤其是群体性的自恋情结时，它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相关的负面效应。^[70]这种群体自恋表现为一种自我优越感。所有的温州人对于当地方言的偏爱程度几乎是惊人的一致，难懂的温州方言与现行的普通话几乎无法沟通。然而，无法沟通的属性非但没有使走南闯北的温州人感到难以适应外面的世界，反而独具本土文化的亲和力，成为一种精神归宿上的整合力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只要是温州人首先都要抱成一团、一致对外，这种本土、同胞意识，血水交融的情义通过温州方言达到高潮，这种自足性与亲和力的背后，却是对其他语系的排斥感和敌视感，尤其对来自江西、安徽、四川等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人所显示出来的自我优越感更是直白。温州人的自恋情结的膨胀，导致一个开放城市吸纳意识的匮乏。在 80 年代以来的人才南下高潮中，温州始终没有成为人才们最向往的热土很大程度上源于这种吸纳意识的缺乏^[67]。

1.34 吃苦与享乐

温州人吃苦耐劳的精神自古已然。“土薄艰艺，民勤于力，妇勤纺织”（张孚敬嘉靖《温州府志》卷一《历史风俗》）。“鸡鸣布”更为典型，“晋浣纱女，永嘉人，事母至孝，纺织为养母，每夜浣纱而旦成布，名为鸡鸣布”（嘉靖《温州府志》卷三《列女》）^{[1]283}“其女红不事剪绣，勤于纺织，虽六七十岁老妪亦然。贫家无棉花、苧、麻者，或为人分纺织，日不肯暇，其女工巧拙视布之粗细为差。《旧志》”谓“地不宜桑而织经工”是也。（弘治《温州府志》卷一《风俗·民事》）^{[1]285}温州民间的素有家庭经营手工业、副业和外出务工经商的传统，弹棉郎为代表，这些以弹棉为主的个体手工业者，在外生活艰苦，往往一年半载或几年才能回家一次。现在的温州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在国内国外都以“勤劳，能吃苦”为大众所赞誉，是吃苦耐劳的精神的一贯体现。

与吃苦相对立，是温州人的对于奢华的追求。讲排场的性格在温州人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富裕起来的温州人把财富很少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而是更多的用于生活消费，追求奢华的生活。温州人买家电，首选进口的；穿衣服，品牌至上；温州的交通工具也尽显霸气，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见奔驰宝马的身影。

宋以来温州商业繁荣。“永嘉县的商业税高达二万五千多贯，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七倍。”^[71]发达的商业，使商人的财富增多，他们“富儿入银，得买序班署丞，兵马隶事诸京秩”。^[72]钱可以买到官位，钱可使社会地位上升。如果没能通过钱走上仕途，就以奢华的生活方式来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抗衡，打破等级观念。温州人讲究排场，追求奢华的风气，历来已久。在宋代，郡俗已是“侈外而窳中，高车大盖，填巷塞途，冠裳履服，士录亡别”；^[73]到明代，社会上拜金之风强盛。温《歧海琐谈》记载：“无论市井庸流、负贩贱品，惟家业温裕，力足以经营之者，苟发一念，无不获遂。”他们“出入闾巷，飞盖追随”^[74]。清朝时温州婚俗已相当奢侈，同治年间奢靡之风愈演愈烈。《永嘉闻见录》载：“永嘉娶妇，先期折银拾饭，送至女家，分给诸工匠之造妆奁什器者，谓之‘六局银’。讲妥以后，就将嫁妆全部扎好迎出，抬抬挑挑，在大街招摇过街，炫耀光彩，道旁人众延颈驻足，夸赞女家之荣。”

^[74]现代温州人仍无改奢华之风,无论是婚俗或丧俗尽显奢靡。温州的婚礼隆重、奢华。温州婚礼非常“奢华”。传统婚礼习俗经过传承和变异,现在主要有三部分组成:婚礼期间,花钱可谓“挥金如土”。温州农村,取媳妇聘金要2至5万不等,城市里就需要10至20万。除此之外订婚时新郎要为新娘买各样首饰,钻戒、金项链、金手链、金脚链等。买“对表”(也称“情侣表”)是温州人独特的订婚习俗。现在买的都是两三万块一对的瑞士名牌表。新人结婚普遍要求新房达到一百多平方米。结婚当天接新娘用的轿车,高则奔驰宝马车,本田次之。一辆奔驰租金要800到1000左右,至少要租五到六辆车,组成车队,温州婚宴排场的奢华,须有龙虾、鲍鱼、鱼翅、野生黄鱼等各样山珍海味并精装五粮液、中华烟等。

温州人不仅婚礼奢侈,丧礼也显出一派奢华之气。丧葬仪礼,过去温州的葬礼,主要以土葬为主。改革开放后富裕起来的温州人更津津乐道:“富不富,看坟墓”,越造越豪华的“椅子坟”,街上越来越长的出殡队伍,成了温州一道特有的“风景”。在“厚葬”风气最烈的时候,出现了“椅子坟”占地二三亩、造坟费达50万元的景象。出一次大殡,要用近百辆车、送葬队绵延二里。温州市每年新添3万座坟墓,按每座最少占地20平方米算,每年就要吞噬土地近千亩。^[75]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浙江省各级政府痛下决心,深化殡葬改革,治理“青山白化”才使其得到有效的抑制。

2. 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特点解析

温州商业民俗文化是温州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地方区域文化的形成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地理环境因素,历史文化因素,居民构成因素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的性格特征的形成,也同样是这些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1 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

所谓地理环境,是指与人类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它包括地形、气候、土壤、湖泊、矿藏以及动、植物等等。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曾有“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76]之名言。近代西方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把地理环境因素对人们气质性格的影响的理论系统化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们的气质性格,人们的气质性格又决定他们采用何种政治法律制度。“气候的影响是一切影响中最强有力的影响”^[77]。尽管被认为夸大了地理环境的重要影响,但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力却是客观存在的。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决定了民俗文化的独特性。按照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文化形态首先是人类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而社会人的性格与行为、风俗与习惯又是文化形态(社会结构、价值体系与社会化方式)的重要内容。简言之,生态类型决定文化形态(经济类型—社会结构—价值体系),文化形态又影响社会人的性格、行为、风俗和习惯。每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的形成,首先可以从各个民族独特的地理形态和自然环境中找到说明^[78]。

人类历史的变迁和民俗文化的形成,是作为社会的人的创造,虽非由自然地理环境直接赋予。但是,自然和地理环境毕竟给人类文化,尤其是给民俗文化的创造提供了物质材料,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的发展趋向和色彩。地理环境是“人化了的自然界”，通过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地理环境日益转化为人类社会内部不可缺少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地理环境是“社会地理环境”。列宁曾转述普列汉诺夫的见解说：“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的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79]黑格尔说：“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80]我国近代的哲人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道：“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81]道出地理环境对民俗文化的影响作用。

温州偏处大东南一隅，西北有括苍山为其屏障，北有北雁荡山，南有南雁荡山，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多地少，区内江河均源出于括苍—雁荡山系，最长的瓯江也不出浙南。区内丘陵地分布很广，山脉多为东北—西南走向，海拔在200-1000米。山间溪涧深切，林木葱郁，风景秀丽，尤以南、北雁荡山峰峦奇特，深谷悬崖，为浙南名胜。山脉向沿海逐渐降低并与海岸斜交或直交，造成曲折的海岸，有众多的岛屿与港湾。

地理环境因素渗透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古代的东瓯(温州)人要与外界交往，或翻山越岭，或泛舟沧海。舍难求易，航海成了最佳的选择。依山临海的自然环境，对形成温州人独特的禀赋有极大的关系。

大海的平静中所蕴藏的无比力量，大海的潮起潮落，通商航行中艰险的航程，摸透大海的变幻不定、喜怒无常的“脾性”是生存的必须，一方面临海越人日积月累，养成其善于观察、预测大势，对“风险”的把握胜人一筹，也造就临海的温州商人中突出的冒险和进取精神。海洋的风险培养了海商的冒险精神，海洋活动的无约束也培养了极端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念，导致追求财富的盲目性与破坏性^[82]，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商业在追求短期利益造成的诚信缺失的弯路。

另一方面，在科技不发达，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条件，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对立，即生存环境对人的压迫。由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变常常对人的生存造成严重的威胁，人的生存必须靠自然的恩赐，但是自然界却往往不如人愿。它作为一种可怕的异己力量成为人类依赖和畏惧的对象。人们对自然界这种异己的力量无法认识和理解从而产生恐惧感。于是，就认为在现实的物质世界之外，一定还存在着另一个为人所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世界，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力量主宰着人的命运，人对它只能顺从、祈求而不能违反。于是，对自然这种异己力量就产生了盲目信仰和崇拜进而把自然界、自然力人格化为神灵加以膜拜^[83]。封建时代相对落后的航海科技，生存逼迫温州人向大海和商业讨生活，两者都是机遇与挑战、财富与风险并存的生存舞台，偶然性的因素发挥着比在农业生产中更大的决定作用，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温州人将生存发展寄托虚幻的超自然的神灵的保佑，渐渐促成温州民间风俗中神信仰的传统。

“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84]。“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85]。“瓯、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皙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艳者，则曰姑。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级，左右老木，攒桓森拱，萝茑翳于上，鸱鸢室其间。车马徒隶，丛杂怪状。氓作之，氓怖之，走畏恐后，大者椎牛，次者击豕，小不下犬鸡，鱼椒之荐，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

缺于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祸亦随作，耄孺畜牧栗栗然，疾病死丧，不日适丁其时也，而自惑其生，悉归之于神”^[86]。

崇祀偶像愈来愈多，鬼神迷信愈演愈烈，到明清时，鬼神崇拜已形成系列，有城隍土地、神化的职司、神化的名人等，神庙遍布城区及各县，多得难以数计^[87]。温州鬼神信仰历久不衰，神多且杂可以说是温州一个鲜明的区域特色，尽管这其中原因很复杂涉地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但地理环境因素对其影响最为根本。

浙南山区，尽为奇峰险壑，土瘠田薄，非坚韧刻苦不能在此居住。因出产不丰，还须“习于机巧”。“土薄难艺，民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红工，不产漆而器用备。”^{[1]285}因为“土薄”，专靠种植业难以营生，农业副业，手工业，商业，渔业能用于生存发展的资源都被“总动员”。

温州人所依之山，可谓集对立统一于一体，充分体现事物发展的两面性，也是温州商业民俗中商人性格两面性的本源：一方面沈括《梦溪笔谈》中“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88]，奇秀的山水钟灵毓秀，养成温州商人机巧、灵慧的个性，王祜《送顾仲明序》有“永嘉，东南名郡。山川峻清，伟人间出，号称六艺文章之府”^[89]的称誉。温州的奇山丽水，也给诗人带来灵感。“中国山水诗之祖”谢灵运，他的山水诗中的绝大部分便是在他作永嘉(即今温州)太守时所作。其诗“俚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90]，今天的温州商人中，成功捕捉商机可比是诗人写诗捕捉灵感，注意观察市场变化，“穷力追新”，在新产品上精雕细刻，塑造名牌。某种程度上或可以说，奇丽山水洞开温州人的心机，真如“锐峰叠嶂，左右环向，奇巧百出，真天下奇观!”^[91]温州商人群起辈出，活跃商海，温州商人的禀性中，是有雁荡山所赋予的灵慧悟性的^[92]。

另一方面可谓“穷山恶水”阻断交通，封闭保守，地少人多，环境恶劣，培植温州人坚韧、刻苦的本性，即为世称道的温州商人吃苦耐劳之特性。交通闭塞也埋下封闭保守的种子，温州商业民俗文化中温州商人性格中保守，侧重近期效益，以区域为核心，重家族血亲地缘排外和自恋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温州海路交界，山水交错的地理条件，对温州人特别是温州商人的生存意识与选择方式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人多地少的生存环境迫使温州人出走四方，“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在商海中讨生活，冲淡了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传统儒家精神，传统封建文化中以农为本、吃苦节俭、朴素谦顺、安贫乐道的精神遭遇追求享受、提倡消费刺激生产，追逐实利的商业意识的实质性的冲击，两种矛盾的力量达到某种冲淡平衡，沉淀在温州人的传统意识中使其表现出对立的两面性的特质，同时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也最终孕育出“永嘉学派”这种重商的特质区域文化来，而“永嘉学派”带有重商特质的文化又强化了区域文化氛围的固有的商业气息。

2.2 移民因素的影响

温州的土著居民极少，今天的温州人基本上是由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从社会学意义上不同人群创造的文化存在差异，不同地域的文化风貌也不尽相同。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也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93]温州历史上曾经历四次移民潮，温州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庆鹏先生所著，《中国犹太人—神秘的温州

人》一书中，对温州历史上的四次移民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94]：

温州历史上的第一次移民潮是从春秋后期越人南迁到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138年）东瓯王国举众北迁。…这一次外迁，对温州的发展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此后近五百年间，瓯越一带因人口稀少，发展极为缓慢；温州历史上第二次移民潮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从永嘉郡的建立到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定名为“温州”的350多年间，是继“东瓯国”之后温州历史上又一次有特殊意义的时期，它不仅为此后温州地区行政区划打下了比较稳定的基础，同时也促进了温州经济、文化的发展；温州历史上的第三次移民潮是唐末五代至两宋时期。…就在两宋时期，温州却出现了中国思想上独树一帜的“永嘉学派”，诗歌国度里开一代诗风的“永嘉四灵”，中国戏剧史上首创的“永嘉南戏”，可以说这是温州历史上经济文化最辉煌的时期；就在两宋时期，温州却出现了中国思想上独树一帜的“永嘉学派”，诗歌国度里开一代诗风的“永嘉四灵”，中国戏剧史上首创的“永嘉南戏”，可以说这是温州历史上经济文化最辉煌的时期；温州历史上的第四次移民潮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先是160万温州人的大量外流，然后才是100万外来人口的流入，…这次大进大出的流动以世界范围为其背景，温州人的外出不仅仅在国内区域性的流动，更是全球性的大流动。

移民的动因是两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即迁出地“推动力”和迁入地的“吸引力”。迁出地的推动力主要是迁出地存在某些不利因素如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等，为了生存被迫迁往他乡。迁入地的“吸引力”显然是指迁入地的优越生存发展条件。温州偏据东南海隅，交通闭塞，山多地少，显然并不具备强烈的吸引力。《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一书认为温州历史上经久不息的大规模移民，其实来自温州南面的福建：^{[7]319}

不仅温州，就是今天台州一带，东汉前与闽越也有瓜葛。闽南人在明清温州府的聚居地，首先是今天闽南的方言区。…在这些地方，由于迁入的闽南人在数量上占了优势，所以能够完整保存、通行其原来的语言。…必须说明的是，闽南人在的实际分布地域要远远超过目前存在的闽南方言区。…由于陆续迁入的闽南移民，与原住民相比在人口上不占优势以及散居杂处等历史原因，未能形成闽南语方言区。福建移民中数量最大的是闽南漳州、泉州地区人，移入温州的原因首先就粮，解决生存问题…福建向温州移民数量比较集中的是明朝嘉靖到清康熙间，正是明朝所谓“倭乱”直到清初的“海禁”时期。…闽南移民就是在明末浙江的“倭乱”逐渐平息之后，经海上来温州落户的。一是躲避闽南仍在延续的战乱，离开本来就缺乏粮食的家乡，就食温州。二是“海禁”趋于严厉之后，海上贸易受到沉重打击，或畏惧官兵的追缴，难以谋生。…至于闽南人选择移居温州，不仅因为温州是福建人的传统迁居地，而且与当时菲律宾等南洋各地的形式有关：菲律宾多次出现大规模驱赶、屠杀华侨的严重事件。…闽南人首先选择的是海岛或沿海半岛地域，…其次选择沿海边缘的山区，尤其是闽浙接壤的地区。…闽南人迁居温州以后，不仅保持原来的语言风俗，而且与祖籍地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早期的移民经济，有种植、煮盐以及商业。…南宋之后，北方移民日渐稀少，陆续到来的新成员基本来自人口膨胀的福建。尤其明末，具有海商文化传统的闽南人大规模迁入，给原有海洋文化的注入新鲜血液，使得温州的区域文化呈现出浓厚的闽南海商文化特色。

福建尤其是漳州和泉州向温州移民的原因同样是生存的逼迫,传统农业条件比温州差得多。《宋史·地理志》福建:“土地迫狭,生籍繁多,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闽省负山环海,地狭人稠,延、建、汀、邵四府,地据上游,山多田少。福、兴、宁、泉、漳五府,地当海滨,土瘠民贫,漳、泉尤甚”(汪志伊:《议海口情形疏》,《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五)^{[7]321}“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足于温,皆以风飘过海。故台、温闭余,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74))农业条件先天不足,这种情况下只能向农业之外寻找出路,经商、下海或者移民都是生存现实逼迫的结果。当时人口压力相对较轻、地理气候条件等环境因素与其相似的温州“稻麦菽粟尚有余饶”成为其首选。

福建尤其漳泉地区“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耕。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夷域”(谢履:《泉南歌》,陈寿祺等《福建通志》卷五十六《风俗》,华文书局1968(1137))^{[7]324}生存的迫使下养成依赖海上贸易取利习俗,“若要富,需往猫里务”“舟至彼中,将货尽数取之,夷人携入彼国深处售之。或别贩旁国,归乃夷货偿我。彼国值岁多珠时,商人得一巨珠携归,可享利数十倍。”(张燮:《东西洋考》中华书局,1981(98))^{[7]324}“航海商贩尽由漳泉于道府,造以引文为据,此皆沿海居民,富民出资,贫者出力,懋迁居利。”(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7]324}为躲避明代严厉的海禁政策的重罚,“沿海奸民犯禁,福建尤甚”,“漳泉等府黠滑军民,私造双轨大船下海”^{[7]324}(《明经世文编》卷三二一)“漳、泉各澳之民,僻处海隅,俗如化外而势毫,散姓人家,又从而把持之,以故羽翼众多,番船联络。”^{[7]324}(《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三)。温州的区域文化商业的功利色彩浓厚,本身沿海的原有的海洋文化得到闽南移民文化特别是海商文化的强化,使得温州在浙东的文化区中突显功利的特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一书认为移民特别是闽南移民对温州区域文化性格的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7]328}:

其一,最突出的便是冒险和进取精神。……其二重商主义精神。……其三,是走四方的经商精神。……天下凡事皆有两面性,传统还要文化亦不例外,尤其是朝廷禁令发展起来的海商文化……一是权钱交易;……二是法制观念缺失的侥幸、蛮干心态。……三是商业诚信迷失……

温州历史上的移民对于温州区域文化性格的最终定型,起到了推动与强化的作用。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的中的商业性格,无不带有移民文化的深刻影响,特别是闽南海商的文化的深重烙印。温州商业民俗文化性格中的两面性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移民文化与区域本土的文化的融合的产物,温州商业民俗文化是温州区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最具有区域特色的部分,温州历史上频繁的移民浪潮给温州的区域文化带来重要的影响:首先,温州历史上移民频繁迁入迁出,对于故土眷恋难舍的移民远离故土,在移入地多为聚居,促成团队合作的精神,体现为移民群体意识的建构与会馆、帮会文化的发达。移民们为了谋生,背井离乡,移民的各种亚文化群体意识非常强烈,作为这种亚文化群体意识的象征,会馆文化是对移民乡土情感失落心理的一种补偿,是其寻根意识的一种表现,是移民力图保持与乡土文化联系的一种努力。^[95]温州在各地建立的同乡会馆,以及温州街正是这种心理的一种体现,但是这种团队合作是一种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的团队合作精神,是对血缘、亲缘和地缘团队外的一种排斥。

温州移民特别是闽南移民所带来的文化,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文化涵化作用即改

变温州本土文化的表现行为和意识行为，对温州人尤其是温州商人的生存意识与选择方式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温州人“走四方”经商精神不仅是人多地少的地理生存环境逼迫的产物，更是在一次一次的移民的迁入迁出中得到强化。在商海中讨生活，重商求利，追求享受、提倡消费刺激生产，追逐实利的商业意识进一步得到加强，得到了闽南海商文化的强化。温州本土中传统儒家精神以及封建文化中以农为本、吃苦节俭、朴素谦顺、安贫乐道的精神遭遇进一步弱化，两种矛盾的力量相互冲撞最终达到某种冲淡平衡，沉淀在温州人的传统意识中使其表现出对立的两面性的特质。在区域地理环境逼迫和移民重商的氛围熏陶下，“重商”的感性文化最终发展升华定型，产生义利并重具有重商特质的区域理性文化——“永嘉学派”来，而“永嘉学派”的重商特质又强化了区域文化氛围内固有的商业气息，使得温州在中国封建农耕文化大背景中突显别样的风采。

2.3 瓯越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

春秋后期，吴越争霸，吴国战败，派使臣王孙雒和越国谈判提出要按照当年的老办法重新处理两国关系，被胜者一方越国范蠡断然拒绝：“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滨于东海之陂，鼃鼃鱼鳖之与处，而蛙龟之与同渚。余虽眊然而入面哉，吾犹禽兽也，又安知是譏譏者乎？”^[96]被认为是浙东越文化轻道义、重功利观念的滥觞^{[7]314}。

经世致用、事功重商的“永嘉学派”，以其鲜明的功利特色有别于传统儒道文化从而成为温州独特的区域文化。这种经世致用、务实功利的文化传统与发展商品经济所需要的观念和精神相吻合，成为推动温州非农产业及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任何一种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源和动力深藏于社会的经济关系之中，但是，这种社会意识一旦产生，就有其相对独立性，就有其独立的发展道路。一般意识形态如此，作为更高的意识形态的哲学，更是如此：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他只和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属于思维的根源……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的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已的独立的发展道路。^[97]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

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和道德的反映。^{[22]485-486}

永嘉学派无疑是在永嘉(温州)地区比较发达的社会经济(包括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从北宋末到南宋初七十余年中,温州偏据东南一隅幸免于兵火之害,社会较为安定,工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已是东南地区重要的工商城市。人口大幅增加,北宋温州户口剧增,《太平寰宇记》卷九九《江南东道十一》载:温州原领县四:永嘉、平阳、乐清、平阳。皇朝户:主一万六千八十二,客二万四千六百五十八。^{[1]12}南宋温州户逾十七万,“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1]1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八),万历《温州府志》卷五《食货·户口》:温州府宋熙宁户一十七万三十五,口九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七。^{[1]12}粮食产量较高,“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1]140}(《止斋文集》卷四四《桂阳军劝农文》)。造船业在北宋末数额已达600艘,与明州(今宁波)同居全国之首。“哲宗元祐五年正月四日,诏温州、明州岁造船以六百只为额”^{[1]273}(《宋会辑要稿》第六册五六五八页)。手工作坊众多,生产具有温州地区特色的漆器、鬲纸、瓷器等产品,出现了雇佣劳动和包买商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形态。《慈湖先生行状》记述温州知州杨简于嘉宁五年离任情况说:“去之日,老稚累累争扶拥遮道……有机户,尝遭徒,亦手织锦字大帷,颂德政。”^{[1]284}(钱时《宝谟阁学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状》,引自杨萼《慈湖遗书》卷十八《附录》)。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农村市镇群体的崛起。在南宋初期,温州的商业繁盛,商人众多,就已闻名全国了。温州城建于东晋太宁元年(323年)周围一十八里,南朝梁代筑有内城,五代、北宋间温州增筑内外城^{[1]386},已是人口众多的城市,叶适《东嘉开河记》中有“市里充满,至于桥水堤岸而为屋”^[2]的描述,永嘉“四灵”之一的徐照《题赵明叔新居》,描写温州“十万人家城里住,少闻人有对面山”。^[98]唐代以来的坊市制度已经破坏,永嘉城内出现夜市,“过时灯火后,箫鼓正喧阗”^{[1]440}。温州市区面积扩大,在城市的周围兴起四个厢:望京厢、城南厢、集云厢、广化厢。(厢是宋代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加强对城内旅客、居民的管理。)商业的繁荣也大大拉动了税收的增长,北宋熙宁十年,永嘉县税场的商税就已高达二万五千三百九十一贯六文,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七倍。叶适《登北务后江亭赠郭希吕》诗有:“何必随逐栏头奴,日招税钱三百万”。郭希吕名津,是当时永嘉县北务的监税官,“栏头”是出外收税的最低级税吏,由此可见南宋永嘉县商税收入之多。温州城外面则镇市林立,永、乐、瑞、平四县共有八镇和许多市以及小市。这八个镇分别为永嘉有白沙镇(北宋政和四年设),乐清有柳市镇、封市镇,瑞安有瑞安市、永安市,平阳县有肥膳镇,泥山镇(今均属苍南县),前仓镇(以上七镇见于《元丰九域志》卷五)。这些镇、市都在农村,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镇的商税也很可观,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瑞安市每年商税是六千二百八十七贯,永安市四千七百零三贯,柳市镇:千零四十九贯七百九十四文,前仓镇一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文。^[99]尽管当时封建经济制度依旧占统治地位,但温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永嘉学者的思想以深刻的影响,永嘉学派功利思想中,经济关系是其根源。

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务实功利的哲学思想在温州商业经济发达的封建文化传统氛围中产生,同时又是对温州区域文化重商主义的传统的强化。洪振宁先生在《永嘉学派与今日温州》^[100]一文中指出:

“永嘉学派的一些思想观点,由于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得到传播,曾经内化在一部分中国人尤其是温州人的意识中,并与温州区域文化其他因素交织一起,在精

神层面上构成了温州区域文化的不同于其他区域文化的一个侧面。它与温州的物质条件、地理原因、其他一些文化背景等，使得温州人能够迅速接受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的基本精神，接受、吸收、改造外来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人。”“如果把永嘉学派看作温州区域传统文化的精神层面的一部分，是一种上层文化的话，那么，正是这种上层文化长时闻地与民间文化相互渗透中有效的作用于处于农业文化社会中的温州人。一旦进入工业社会，这种旧文化许多因素便被改造和融合，影响力日渐趋微。也就是说，它只是今天新文明得以发展的其中的一种文化资源、土壤和养料。”

商业民俗文化作为温州区域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永嘉学派的这种强化作用对其影响无疑更为全面也更为深刻，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31 新的义利观

“重义轻利”是中国传统道德原则，永嘉学派自开创之初，王开祖《儒志编》便不谈义理；周行己继承张载的“学贵于有用”思想，南宋永嘉学者本此学风，薛季宣对当时实际问题很有研究，曾公开主张“毋为徒诵[道家]语录”，进而反对空谈义理，认为“义理之学不必深究”^[101]。在注重事功的前提下，永嘉学派主张“义利”统一观。其创始人薛季宣即提出：利是义之和，即利与义是一致的。“财者，国用所出，其可缓乎？虽然，为国务民之义而已。……务民之义，则天下一家，而财不可胜用，藏之于民，犹在君也。……惟知‘利者为义之和’。而后可与共论生财之道。”^[102]（《大学解》，《浪语集》卷二十九）叶适更指出：“古人之称曰：‘利，义之和’；其次曰：‘利，义之本’。”^[103]认为仁义道德应以功利为内容，而且通过功利表现出来，没有功利，仁义道德就会变成空洞的说教，不能存在。

永嘉学派不尚空谈义理、讲究功利实用的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对于生长其文化背景下的温州人有着深刻的影响。温州商业民俗文化中对立的双重性格，在一定的程度上的是一种义利对立的表现。温州人经商，发展商品经济是取利、重利，会做买卖，会赚钱，能发财，是值得自豪的。温州人敢于突破旧的条条框框的束缚，胆子大，富有创造性，赢得“敢为天下先”美名，得益于其区域文化的熏陶。但是温州人在某种程度上将“义”现实化，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出现了违法乱纪、非法经营、见利忘义的短期行为，砸了温州的牌子，毁了温州的声誉，这无疑是重商重利的负面影响，好在这种短期行为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当地政府的严厉惩处，使得这种见利忘义的短期行为得到及时的修订。永嘉学派传统文化中义与利的对立统一内化进为该区域商业民俗文化的性格中，使其呈现双面性的特质。

2.32 工商皆本论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以农为“本”工商为“末”，“重本轻末”给中华民族打下深深的烙印。发展商品经济，经营工商业，既是“逐末”，也是“言利”，必然会受到封建政治权力和正统经济思想来的压制，尽管如此，我国工商业还是在封建社会的夹缝中顽强地发展，特别是北宋以来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在此社会背景下，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已认识到工商业生产对国家、对社会的重要作用，在承认农业生产重要性的前提下，反对政府限制

工商业的发展,批评“厚本抑末”思想。主张“以国家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104],发展工商生产,然后才能使“治化兴”,反对征榷、经总制钱、折帛、和买等繁重税负。主张对工商业者采取放任自由政策。“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合、敛散、轻重之权,不出于上,而寓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呜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105](《水心别集》卷2《进货·财计上》)。”要求政府给予工商界的优秀人士以出仕的机会,在政治上有代表人物和发言权。“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蒸进髦士古人盖日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99]484}(《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二)。工商皆本的思想对温州的商业民俗文化影响可谓深远,永嘉学派工商节本的思想在温州发达的工商业传统的区域文化背景中产生,同时又对工商业的发达有一个良好的促进。温州商业民俗中商业和手工业结合紧密,相辅相成。温州商人有销售网,也有加工基地,同时经营范围很广,从日用杂品到高科技产业,一应俱全。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促成温州发达的工商业传统和“百工之乡”的产业传统。漫长历史中形成了农村比较发达、门类齐全的手工业和众多的小商小贩,这就为发展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提供了大量传统技术和能工巧匠,造就了大批善察行情、经营有方的生意人、购销员,生产经营小商品因而具有独特的优势。永嘉学派工商节本的思想强化了温州区域内商业民俗文化中,工商结合紧密,相辅相成的文化传统。

2.33 雇佣价值观

雇工经营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社会经济现象,它在奴隶社会就有个别地方存在;到了封建社会,随着小商品生产的发展,雇工经营也有所发展;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雇工经营发展成为普遍的、典型的形态;中国出现雇佣关系的现象较早,承认其合理性的却很少见到,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在其重要著作《水心别集》卷三中,提出:

盖富人之所以善役使贫弱者,操其衣食之柄也。使其尽表食之欤?则力费称而无名;使其拒而赞之衣食欤?则柄失而势衰。是故使之以事而效其食,或汲或负,或筑或锄,则其力之弗任者,虽饥且死,不敢食矣。^{[105]671}

叶适强调以“事”受“食”实为一种雇佣关系,承认雇佣劳动的合理性,认为不劳动或不能胜任其事,则“虽饥且死,不敢食矣”。社会主义社会里,雇工经营曾被认为是剥削现象,被全盘否定。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发展,温州地区普遍出现雇工经营,由此引发对温州模式的争议。然而在温州经济格局形成过程中,雇佣劳动作为剩余劳动力的一种转移方式,一种商品经济现象被接受,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永嘉学派肯定雇佣劳动的合理性,对于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的影响也极为深刻。温州“机户”产生较早,雇佣劳动现象也最为普遍,温州民间的素有家庭经营手工业、副业和外出务工经商的传统,现在的温州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在国内国外都以“勤劳,能吃苦”为大众所赞誉,不仅体现出一贯的吃苦耐劳精神,同时也还是对以“事”受“食”是这种种雇佣关系的一种体现。

2.34 重商主义的负面性

事物发展总是有两面性的，永嘉学派重商思想是在个体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商品意识和功利主义带有浓厚的个体小农经济的烙印。重商文化传统对温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商人重利，温州在发展经济中商家短期行为、急功近利、金钱至上，一度出现的假冒伪劣、偷税漏税、市侩主义和过于功利主义还在市民的思想意识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商人重享受，重消费拉动内需，生活极尽奢华。温州的区域风俗中婚礼隆重、奢华。在宋代，郡俗已是“侈外而窳中，高车大盖，填巷塞途，冠裳履服，士录亡别”^[73]；到明代，社会上拜金之风强盛。清朝时温州婚俗已相当奢侈，同治年间奢靡之风愈演愈烈。现代温州人仍无改奢华之风，无论是婚俗或丧俗尽显奢靡。温州讲究排场，追求奢华的风气，丧礼也显出一派奢华之气。以至于青山白化等无法回避的负面事实，无不是重商主义消极影响的结果。好在温州人已经开始认识到温州的重商主义的文化传统同现代社会的冲突以及对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妨碍。在经济工作中强调产业提升，加强群体意识，创造一种新的经济环境；用新的积极的文化因素替代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传统；扩大生产规模，推进科技进步等。对永嘉学派传统文化的进行扬弃，秉承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使其优良传统可以当今的改革建设兼容，并发挥出积极作用仍是温州人背负的艰巨任务。

文化是反映人们共同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创造了发展环境和发展方式，文化影响具有鲜明的区域性。某种程度上，当代温州模式及其各种商品经济行为是成了思想文化的历史必然映像。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功利思想奠定了温州人重实际、讲实利、求实效的思想文化基础，永嘉学派反对空谈义理，讲求事功，主张从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去致力于富国强兵的实业思想，反映了当时自由商人、工商业者的进步思想，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务实功利的哲学思想在温州商业经济发达的封建文化氛围中产生，同时又是对温州区域文化重商主义的传统的强化。商业民俗文化作为温州区域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永嘉学派的这种强化作用对其影响无疑更为全面更为深刻。

3. 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研究价值和意义

温州的商业传统与温州人的商人性格，给温州区域文化涂上浓重的商业色彩。温州的商业民俗正是在这样悠久的商业历史背景下，在长期的商业生活中逐渐形成。商业民俗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正是在一些看似平凡琐碎的杂事中展现，商业民俗文化，是一种广泛的社会存在。温州商业民俗是商品流通领域中的民俗现象和社会习惯。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变迁和人们理念意识的改变，传统的市井习俗也在不断的更新和优胜劣汰。这种变化，对于认识当前的社会风情，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其研究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3.1 丰富我国民俗学研究内容

仲富兰老师在《民俗文化学导论》中说：“民俗文化是一种基础文化，它是特定的民族在历史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文明成果”，……民俗文化是时代的产物，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展

开的。民俗文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的问题,而且是作为一种行为方式、生活模式,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而存在。”^[106]

商业民俗学的研究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很热的部分,虽然区域性的商业旅游文化的论著很多,但商业民俗研究还是相对分散。乌丙安先生《中国民俗学》一书中对于市的民俗、商的民俗以及市商的民俗标志的论述奠定了商业民俗研究的基本范围,以后的商业民俗研究最多部分也主要是这三个方面。何学威先生《经济民俗学》对于商业民俗部分的有了进一步的推进,研究的领域有了更多的细化分为:交易场所的民俗、交易方式的民俗、商业方式的民俗、商业标志的民俗、商业语言的民俗,并对每一部分内容有了更多的细化;王锐老师在《市井商情录—中国商业民俗概说》一书中提出将商业民俗文化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并对商业民俗文化的研究的进行理论化和系统化。可以算是商业民俗文化研究的集大成者。商业民俗文化的研究拓展需要对丰富的区域商业民俗事象的进一步研究,温州具有发达的商业历史和丰富的商业民俗传统文化,研究温州商业民俗文化无论是对于我国区域民俗研究和商业民俗研究都具有丰富和深化的价值。

3.2 丰富温州区域文化内容

温州经济研究一直是个热点,商业一直是温州经济中的亮点。温州人,温州模式的研究如火如荼,从民俗学角度研究温州商业经济,全面系统研究温州民俗文化相对空白。

民俗是文化复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Burnet Tylor)言:“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107]国学大师钱穆认为:“风俗为文化奠深基,苟非能形成为风俗,则文化理想仅如空中楼阁,终将烟消云散。”^[108]相对于精英文化或雅文化而言,民俗文化是一个基础层次。崇尚雅文化、轻视俗文化是文化研究一贯的传统之一,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化史》中认为俗文学“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109],民俗文化是精英文化或雅文化的基础所在,离开这个基础,高雅文化乃至整个文化将成为无源之水,“终将烟消云散”。

温州偏局东南海隅,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地少人多,山峰峦奇特,林木葱郁,风景秀丽。在此独特地理历史条件下,瓯越先民在适应自然和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独特的风俗。温州商业发达,历史悠久,商贸业一直在温州古代经济中居重要位置,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经济异军突起,别具特色、饱受争议,聚焦了太多关注的目光。温州人具有典型的商人性格,在这块具有浓重商业色彩的区域中,商业民俗文化不仅是其区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同时是其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有关温州商业民俗的研究比较分散,且理论深度提升的空间很大,温州民俗文化系统的研究对于丰富温州区域文化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

3.3 促进温州商业发展和社会良性运行

“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礼记·乐记》)^[110]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发扬商业民俗中优良传统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促进温州经济文化建设都大有裨益,对于保持社会稳

定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乃至商业文化和商业民俗中借鉴有益的营养对于完善我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对于温州商业民俗中的陋俗部分加以引导和改造，有利于温州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这正是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

一般来说，民俗文化中“良俗”与“陋习”是依照其对今日社会的生产、生活、对人民的物质生活和身心健康以及对现代科学与文化传播的影响而论的。商业民俗的良、陋之分同样也是看其对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对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建设以及对促进和繁荣我国的商业健康发展是否有利。温州商业民俗文化别具魅力，其发达的工商业传统，民俗文化中创造、合作、诚信吃苦耐劳的品格都是温州民俗文化中光彩照人需要发扬的部分，而其中守旧、排外、奢靡、短期行为等需要进一步引导改造，继承发扬良俗与引导改造陋俗促进温州商业健康发展、促进温州社会经济进步一个都不能少！

结 语

商业民俗文化研究是民俗学与工商业相互沟通的一座桥梁，与我国商品经济发展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紧密相连，温州商业发达，历史悠久，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笔者在对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的考察中，翻阅繁杂的地方古籍文献，并参与温州市 2008 年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对温州商业民俗相关部分作大量的田野调查。论文的写作中关注那些相对稳定的由古代传承至今的民俗事象，也关注那些对当代社会风俗变化有影响的民俗事象，探寻其动态发展以及流变；同时兼顾新的已有一定影响商业民俗文化的民间商业生活事象，力求将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的考察视角与温州商业经济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结合起来，并产生积极的作用。

诚然，要把温州区域内繁杂琐碎的商业民俗文化事象梳理清楚，并探寻其源流及其文化传承意义，绝非易事。在第一部分，仅择较为典型的部分进行传承、流变考查。在第二部分的文化分析中，仅从区域地理、历史人文两个最为基本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深度有待进一步的拓展；温州商业民俗文化的作用与价值，有些论述与结论不够精准。限于篇幅与本人学识，本文未能挖掘展现之内容，有待于笔者今后更加辛勤的探索。

附图

（笔者参与浙江省非遗普查的部分田野照片）



金乡清明庙会

活动场景



瞿溪二月初一庙会



马仙庙会



上塘殿庙会



白石会市



三月三郑氏祭祖



老店金三益

致谢

论文杀青，终于可以付印了。回想从选题、搜集资料到写作，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在此期间，有过浮躁、困顿，也有过惊喜，现在充满心间的只有感激和继续求索的渴望。我觉得自己这三年的学习生活特别的幸运，在这篇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得到很多老师、同学的帮助，也得到了家人、朋友的鼓励，在此我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最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张靖龙教授。本文从选题、搜集资料到写作、修改到最后定稿，先生都给予悉心的指导。他对学术的执著、睿智深刻的思想、敏捷的思维、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风趣幽默的语言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他的一名研究生，我是幸运的，学业上得到了严格的要求，生活得到了亲切的关怀，对老师的感谢是言不尽意的。还要感谢邱国珍教授、赖施虬副教授、姚周辉教授、林维民教授、蔡克骄教授、黄涛教授、韩雷老师、武宇嫦老师等诸位老师的指导和关心、鼓励和指点，给自己三年的研究生的读书生涯留下美好回忆！

感谢温州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的各位老师，在文献查询搜集方面，特别是特藏阅览室的万军老师和周汝英老师给与本人论文材料的搜集与查询所提供的大量帮助。田野考察方面特别要感谢温州市群众文化艺术馆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的老师特别是江天艳老师、曹钢老师，在搜集和查找相关资料时给予我的帮助和支持，使我最终可以顺利完成温州商业民俗相关田野资料的搜集。

感谢郭丽锋、王亚军、杜翠敏、高原、沈松柏等各位同门以及丁阳华、赵科峰、武玉秀、胡保永、周晋等各位同窗在学习和生活上的关心和照顾。

此外，特别感谢人文学院和研究生部的领导、老师，在我们求学的历程中，他们尽最大可能为我们提供了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研究环境。

最后，谨以此文献给我最挚爱的父母，与我的家人特别感谢我的妻子赵颂萍女士给与的一贯的鼓励与支持，使我保持较好的状态完成论文的写作。

感谢在本论文写作过程中所有关心、支持、帮助过我的人！感谢文中所引用文献的编、引、译著者！感谢审稿的老师和出席答辩的专家、评委。

谢谢！

参考文献

- [1]俞光. 温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M]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1
- [2]金柏东. 温州历代碑刻集[M]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11
- [3]李浩然. 温州新跃迁[M]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2
- [4]王锐. 市井商情录—中国商业民俗概说[M]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 2
- [5]王静, 许小牙. 掮客、行商、钱庄—中国民间商贸习俗[M]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46
- [6]武文. 中国民俗学古典文献辑论[M]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123
- [7]史晋川等.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温州模式研究[M]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422-423
- [8]戴振韬. 区域经济研究兼论温州经济崛起的奥秘[M]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8. 189
- [9]林文益. 中国商业简史一八四零年以前[M]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5. 56
- [10]张福祥, 段进册. 中国集贸市场[M]西安: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37
- [11][清]王文诰. 苏轼诗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2119
- [12]陈伟明著. 唐宋饮食文化初探[M]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3. 86
- [13]麻根生. 湘西墟场文化[M]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6
- [14]许宗斌主编, 乐清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箫台清音乐清人文集羽[M]北京: 线装书局, 2001. 732
- [15]高有鹏. 庙会与中国文化[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256
- [16]雷梦水. 中华竹枝词[M]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7. 2212
- [17]郁宗鉴, 侯百朋温州故实杂录. [M]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228
- [18]陈瑞赞. 东瓯逸事汇录. [M]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31
- [19]潘猛补编. 温州历史文选[M]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222
- [20]胡念望. 温州览胜[M]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6. 260
- [21]无箏, 余璞. “拦街福”承接民俗与旅游. 温州商报[N]2005. 8. 23
- [22]庄千慧, 曾荷绿. 温州民俗“拦街福”让市民大饱眼福. 浙江日报[N]2005. 10. 03(5)
-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94
- [24]党诚恩. 中国商业史话[M].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7. 19
- [25]张善文注. 周易[M]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1. 233
- [26]林尹注. 周礼今注今译[M]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5. 149
- [27]田晓娜. 四库全书精编子部[M]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247
- [28]潘同生. 中国经济诗今释[M]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231
- [29]冻国栋. 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M]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6. 350
- [30]叶大兵. 温州民俗大全[M]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150
- [31]金良年. 论语译注[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230
- [32]高敏. 时不我待: 拯救温州“老字号” [N]. 温州晚报, 2006·10·22(3)
- [33]曲彦斌. 中国典当史[M]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3
- [34]钱伯城, 李国章. 中华文史论丛第六十二辑[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187
- [35]曲彦斌主编. 中国典当学—典当学原理教程[M]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51
- [36]刘水忠. 聚焦典当业[J]经贸导刊 2001(2): 14-17
- [37]中国金融学会编. 中国金融年鉴 1990. [M]北京: 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出版, 1990. 314
- [38]余耀华著. 中国价格史先秦~清朝[M]北京: 中国物价出版社, 2000. 77
- [39]陶思炎. 中国都市民俗学[M]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66

- [40](清)宋继郊(王晟等点校.)东京志略[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374
- [41]温州市志编纂委员会.温州市志[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8.1742
- [42]傅立民,贺名仑.中国商业文化大辞典[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4.137
- [43](唐)刘禹锡(瞿蜕园校)刘禹锡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40
- [44]《唐律疏议》卷26《杂律》[M]北京:中华书局,1983.500
- [45]郭东旭.宋代法制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294
- [46]张力.经纪人指南[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92
- [47]钟兴永.中国集市贸易发展简史[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174
- [48]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98
- [49]贺润坤.中国经济简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209
- [50]郁宗鉴,侯百朋.温州故实杂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259
- [52]李元华.温州民间融资及开放性资本市场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34—40
- [52]叶大兵.论温州民俗对“温州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影响[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4):105—111
- [53]陈清义.中国会馆.[M]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1999.3
- [54]郑学檬.传在史中中国传统社会传播史料选辑[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165
- [55]刘悦坦.20世纪世界广告流派[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164
- [56](元)关汉卿(康保成,李树玲注)关汉卿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302
- [57]沙先贵.水浒辞典[M]武汉:崇文书局,2006.469
- [58](宋)吴自牧(符均,张社国校注)梦粱录[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118
- [59](战国)韩非(唐异常,杨新正).韩非子[M]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2001.212
- [60][元]马端临.传世藏书·史库·文献通考(1—3)[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9.261
- [61]张则忠.中外古今广告集趣[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12
- [62]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委员会.中国谚语集成浙江卷[M]北京:中国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1995.773
- [63](东汉)应劭(吴树平校译).风俗通义校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339
- [64]周谷城.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46
- [65]俞光.温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269
- [6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温州农村调查组.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J]经济研究1986(6):3-18
- [67]孙良好.温州区域文化现实图景剖析[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4):78-83
- [68](汉)司马迁(梁绍辉标注)[M]兰州:史记.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954
- [69]瓯文编.温州之行—各界人士话温州[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300
- [70]孙良好.温州区域文化现实图景剖析[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4):78-83
- [71]蔡克骄.瓯越文化史[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51
- [72]转引蔡克骄.温州人文精神剖析[J].浙江师大学报.1999(2):30
- [73]戴栩.江山胜概楼记.潘猛补编:温州历代文选[C].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79
- [74]转引蔡克骄.温州人文精神剖析[J].浙江师大学报.1999(2):29
- [75]顾春.殡葬:温州清理“椅子坟”[N]人民日报·华东新闻,2003.01.27(2)
- [76]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844
- [77]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311
- [78]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35
- [79]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9
- [80]黑格尔.历史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124
- [81]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全编(第三册)[M]上海:广益书局,1948.85

- [82]史晋川等.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温州模式研究[M]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335
- [83]朱西周. 论宗教产生和发展的根源[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04(9): 32-35
- [84](东汉)应劭(吴树平校译). 风俗通义校释[M]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339
- [85](汉)司马迁. 史记(第一卷)[M]吉林: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 175
- [86](明)姜准. 岐海琐谈[M]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201
- [87]蔡克骄. 瓯越文化史[M]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78
- [88]何明, 井彩霞. 游记散文[M]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22
- [89]胡朴安. 中华全国风俗志[M]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108
- [90]穆克宏. 文心雕龙选注译本[M]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5. 37
- [91](明)徐弘祖撰. 徐霞客游记[M]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96. 5
- [92]胡太玉. 温州商人[M]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11
- [93]葛剑雄等. 简明中国移民史[M]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586
- [94]李庆鹏. 中国犹太人—神秘的温州人[M]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 110-120
- [95]乐正. 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 1860-1910[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189
- [96]国语卷二十一·越语下[M]上海: 上海书店, 1987. 265
- [9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501
- [98](宋)徐照等. (陈增杰校点)永嘉四灵诗集[M]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59
- [99]转引周梦江. 叶适与永嘉学派[M]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8
- [100]张义德等. 叶适与永嘉学派论集[M]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0. 450
- [101]潘善庚. 历史人物与温州[M]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 94
- [102]转引张义德等. 叶适与永嘉学派论集[M]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0. 520
- [103](南宋)叶适. 习学记言序目(上册)[M]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155
- [104]转引李丁富. 老百姓经济学—温州人经济发展启示录[M]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 193
- [105]叶适集(刘公纯, 王孝鱼, 李哲夫点校)[M]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659
- [106]仲富兰. 中国民俗学文化学导论[M]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21
- [107]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M]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
- [108]钱穆. 中国学术通义[M]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1984. 56
- [109]郑振铎. 中国俗文学史[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5
- [110]张少康, 卢永. 先秦两汉文论选[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266

● 附：笔者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1. 《导师印象小记》(《中国研究生》2007.8)
2.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解读》(《神州民俗》2008.1)
3. 《孙悟空自称外公民俗学解析》(《温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2)
4. 《纵横的传播学分析》(《红河学院学报》2008.3)
5. 《解读温州商业禁忌民俗》(《社会科学论坛》2009.4)
6. 《金庸小说中“蛊”俗寻根》(《寻根》2009.6)
7. 《温州“拦街福”的民俗应用启示》(温州大学民俗学论文集 2009)